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
俞可平／主编

Run Away

失控的世界

［英］安东尼·吉登斯 Antong Giddes／著
周红云／译

RUN 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The intuitive explanation of the
simple. If a dollar is taken away fr
penditures by the amount of his m
and, if this dollar is given to a wor
tures by the amount of his margina
quantitative effect on income dep
these marginal propensities diverg
statistical models are based show
are, at least, close together. If we
ist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pend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pend or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

失控的世界

——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

RUN AWAY WORLD

[英] 安东尼·吉登斯 Antong Giddes/著
周红云/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控的世界/(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俞可平主编)

ISBN 7-210-02439-5

Ⅰ.失...　Ⅱ.①吉...②周...　Ⅲ.国际经济关系-经济一体化-社会影响-研究　Ⅳ.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040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赣字:14-2001-285号

失控的世界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周红云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10千

ISBN 7-210-02439-5/F·357　　定价:15.00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17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jxpph@163.net

出版者的话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有人认为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便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加速相互影响和某些方面趋同的过程。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一个国强民富的大国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眼

前。但不可否认，我们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方面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除我们自身的不断努力外，我们还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成就为我所用。马克思说过，未来新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成就基础之上的。这个“高度发达成就”，当然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层面。

新的时代要求我们有更博大的胸怀，跟上国外最先进的社会发展潮流。作为出版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了解国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形成的新建树及新进展，通过不断引进国外新的、先进的思想、优秀的文化成果，来丰富开阔我们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问题，以期在同一发展层面上与世界对话。因此，我们这套《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便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

我们将丛书定位于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是据于以下考虑的：首先所选书目均对当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次，它不属于某一专门学科，它具有跨学科性、综合性、开放性，涉及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法律等诸多学科；再次，所选著作的作

者在西方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西方公认的学术大师。最后，我们注重丛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作用，注重对我国学术界有建设性影响。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学者毕竟是西方学者，他们的思想无一不打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将西方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为人类终极的共同价值的鲜明倾向，从而有将全球化定位为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趋势。这套译丛，无论是个案的研究剖析、专题讲座或专题研究，在现象的揭示和学术研究的字里行间，都有其意识形态的清晰印记，文中所表达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当代资本主义其形式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其本质属性并未改变。全球化的经济将给我们的政治、文化、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它将使世界更加地开放，更加一体化，也更加丰富多样。因此，在阅读本丛书时就特别需要我们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态度，才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进程和融入更加丰富多样的全球化政治、文化和生活之中，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这也才符合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总　　序

这套译丛主要收录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一些深有影响,代表西方学术发展的方向,同时又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足够关注的学术著作。作为学术名著,除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知识创新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必须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一本著作要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基本的条件就是必须假以时日,有足够的时间来验证其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严格地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这些著作,从

时间上说还不具备称得上名著的资格。所以,本译从所收录的这些名著,只能说是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并且得到多国学者推崇的著作。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西方学术界的同仁推荐给我的,它们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这些著作的作者和编者都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权威学者,享有很高的学术威望。其次,这些著作所涉及的理论和观点,代表了西方主流的观点。这里的所谓主流,指的是这些理论和观点在西方学术界的主导地位,而不论这些作者属于激进的左翼,还是保守的右翼。最后,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或理论观点,都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并预示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译丛第一批推出的四本著作。大体上都具备了这些特征。例如,帕特南教授的《使民主运转起来》,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通过对意大利的长期个案研究,分析了社会经济政治变迁的内在原因。此书在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影响极大。吉登斯教授的《失控的世界》,将作者近年来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运用于对现实生活的分析,告诉人们"全球化正在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罗西瑙教授主

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是方兴未艾的全球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奠基之作，开辟了一条分析全球化时代政治生活的新途径。赖纳教授主编的《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深刻地反映了各主要国家面临全球化冲击的文化回应，是了解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变迁的基本参考书籍。

作为本译丛的主编，在第一批著作出版之际，容我首先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朱卫东先生。他们本着繁荣学术研究的宗旨，不惜重金购买版权，并以很快的速度出版发行这套译丛。还要感谢各位译者的辛勤劳动，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各自承担的翻译任务，功不可没。最后，欢迎国内外学界的同行，热忱推荐优秀的西方学术著作，俾使译丛能继续下去。

俞可平

2001 年 6 月 13 日

译者的话

安东尼·吉登斯是一个多产的国际知名学者，并且颇受西方政治家的青睐。至今为止，他出版的著作有30多部，他的著作已被译成22种语言。他曾任英国布莱尔首相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可以说，在西方国家，吉登斯是一个将学术理论与政治现实非常“巧妙”地结合起来的典范。他既善于写深奥难懂的学术著作，又善于写浅显明白的通俗书籍，帮助读者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摆在我们面

前的这本小册子《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就属于后一类著作。

读过吉登斯其他一些著作的读者将会发现，他的纯学术著作有时非常令人费解，因为他很喜欢提出一些新词和新概念。然而，《失控的世界》这本小册子却并非如此。仔细读过这本小册子之后，您就会发现，短小精炼的篇幅、生动熟悉的例子、深邃的洞见是这本书的特点。他用简朴而真实的事例说明了如何观察和理解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视角，帮助我们清醒认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急剧变迁的“全球化”时代。这是世界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不仅仅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且几乎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球化已不是什么新词了，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无处不在，这是事实。全球化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它还包括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等。然而，关于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真正含义等问题，不同的学者却有着极其不同的看法。

吉登斯指出，对全球化的看法存在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有些人对全球化持完全怀

疑的态度,他称这些人为怀疑论者。他指出,怀疑论者认为,“所有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只是一种谈论而已”;全球经济并不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与以前存在的经济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这个世界仍然像以前一样运转;全球化这个观念只是那些希望拆除福利体制、减少国家开支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所散布的一种意识形态而已。另一方面,有些人却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吉登斯将他们称为激进论者。他们认为,不仅全球化是真实的,而且它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被每一个角落感受到;全球市场比以前有了巨大的发展,不再受制于国家边界的影响,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全球化这个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给我们所处的世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等。吉登斯将自己归入激进论者一边。但是,他同时认为,即使激进论者也不是已经正确地理解了什么是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认为,怀疑论者和激进论者几乎都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现象的。

与只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全球化问题的学者不同,吉登斯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来考察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在第一章中,他说明了全球化的含义并阐

明了自己的立场。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吉登斯首先讨论了风险这个问题。在吉登斯看来，风险这个概念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吉登斯使用风险这个非常简单的概念来帮助人们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同时，对于怎样规避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吉登斯也有自己的看法。在第三章中，吉登斯讨论了传统问题。他指出，传统其实是与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他认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社会正变得非传统化，这是正在出现的全球社会的核心和关键。但是，吉登斯认为，传统是必须的，而且总应该被坚持，因为它们给生活以连续性并形成生活，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走向原教旨主义那一面。吉登斯在批判了原教旨主义的同时，强调了世界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和意义。在第四章，吉登斯讨论了家庭问题。吉登斯指出，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变迁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出现的变化，比如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变化。在这一章中，吉登斯为我们提供了怎样思考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如何建立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等很有价值的分析。在最后一章中，吉登斯讨论了全球化时代的民主问题。全球

化时代的民主将何去何从，吉登斯给了它一个最终的归宿，那就是：我们这个失控的世界需要民主。

总之，吉登斯的这本小册子为我们分析了不断增长的全球依赖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他超越了传统经济的视角，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对全球化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他分析了全球化是如何影响我们中的每一个人的；他考察了风险、传统、家庭以及民主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他为我们提供了认清自己和认清这个世界的有益视角。正如《金融时报》对这本小册子的评价所指出的："这本小册子充满了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何去何从的深刻洞见"。

为使读者更加全面了解吉登斯的理论，书末收录了我的同事杨雪冬博士翻译的三篇吉登斯的重要文章以及由杨博士撰写的"吉登斯其人其书"一文。对杨雪冬博士的合作和支持，我深表感谢。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前言

这本书开始了我 1999 年在 BBC 作莱思讲座主讲人的生活，主要在 BBC 4 台和世界服务节目中作主持人。成为 20 世纪最后一名莱思讲座主讲人有着某种异样的感觉。这样一个时候对我来说，似乎很适合于抓住世纪末的世界状态中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主题。我希望这种讨论将激起争论，而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它们受到了全世界报纸和杂志的抨击，这一点使人非常满意。幸运的是，它们也吸引了

许多拥护者和赞成者。

我称它们是一种讨论,并给这本书取名为《失控的世界》,是因为这个词表达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快速变迁时代的许多人所具有的感情。但是,我不是第一个使用“失控的世界”这个词的人。我甚至也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莱思讲座主讲人。莱思讲座的这个题目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艾德蒙德·里奇(Edmund Leach)大约在二三十年前提出来的。然而,他在这个题目后面打了一个问号。我认为现在不再需要这个问号了。

里奇在伦敦的广播大厦深处的某个录音室录制他的演讲,直到最近每一位演讲者都是如此。在1998年,战争历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没有按照惯例在一位请来的听众面前进行演讲。在每次演讲之后都有一段问答时间。我的节目也有这样的形式,不过因为这些演讲是在国际上进行的,每一次都标志着新的旅程。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关于全球化和民主的演讲是在伦敦进行的。而关于危机、传统和家庭的演讲则分别在香港、德里和华盛顿进行。每一次演讲都获得了听众强烈的反响,我想应该感谢每一位听众。

我还要感谢每一位通过演讲现场的互联网设备

参与讨论的参与者。我们是想发起一场关于全球化的全球性的电子方式的讨论。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很多人发来了他们的想法和批评。我希望他们能原谅我不能够单独回复他们提出的观点和问题。

在演讲的过程中,另一些人参与得更多,无论演讲获得了怎样的成功,我都感觉欠他们很多。我想对以下人员特别致谢:调音师詹姆士·博伊尔(James Boyle)、BBC 总裁克里斯托佛·勃兰特(Christopher Bland)爵士、制片人格温内思·威廉姆(Gwyneth William),以及查理·赛格勒(Charies Sigler)、斯密太·帕特尔(Smita Patel)、格雷·威斯比(Gary Wisby)、马克·拜福特(Mark Byford)、马克·斯密斯(Mark Smith)、马里恩·格林沃德(Marion Greenwood)、珍妮·艾伯拉姆斯基(Jenny Abramsky)、休·莱纳斯(Sue Lynas)、马克·达姆泽尔(Mark Damazer)和希拉·库克(Sheila Cook)等 BBC 工作人员;BBC 的推荐人员也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马特·弗雷(Matt Frei)、马克·塔里(Mark Tuly)和布里奇特·肯塔尔(Bridget Kendall);安娜·福特(Anna Ford)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帮助;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安妮·迪·赛拉(Anne de Sayrah)、丹尼斯·安尼特(Denise Annett);做了非常仔细的手稿记录整理工作

的梅里安·克拉克(Miriam Clarke),以及阿曼达·古德尔(Amanda Goodall)、阿里逊·奇弗(Alison Cheevers)、克里斯·富勒(Chris Fuller)、菲奥纳·霍奇森(Fiona Hodgsons)、鲍里·霍尔泽(Boris Holzer)和雷吉·辛普森(Reggie Simpson)。我要对艾伦娜·莱登尼瓦(Alena Ledeneva)的建议和支持表示特别的感谢。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阅读了多个版本的草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批评。

安东尼·吉登斯

1999年6月

引 言

“这个世界正急匆匆地走向它的尽头”，一个名叫沃尔夫斯坦(Wulfstan)的大主教1014年在纽约布道时这样说。我们很容易想像今天人们所表达的相同的情绪和感情。每一个时代的期望和焦虑仅仅是以前时代的重复吗？在20世纪末，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真的与以前不同吗？

是的。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些对

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个地区，而是几乎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时代的发展受到起源于17和18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和理性思维的影响。通过那些反对宗教及其教义的影响并希望用更理性的方法对待现实生活来取代它们的思想家的著作，启蒙运动对西方工业文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启蒙哲学家们依据的规则简单但显然非常强而有力。他们认为，我们越能够理性地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就越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塑造历史。为了控制将来，我们必须使自己从过去的习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

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启蒙思想，他非常简单地阐述上述观念。他认为，为了创造历史，我们必须理解历史。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世界将变得越来越稳定和更加有秩序。甚至许多反对马克思的思想家也接受了这一观念。例如，小说家乔治·豪威尔(George Orwell)期盼一个非常稳定和具有可测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将成为这个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机器中的一个小螺丝。许

多社会思想家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是这样。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了我们自己。然而，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不像他们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而且，有些被认为是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确定和可预测的影响，如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却经常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例如，全球气候变迁及其伴随的危险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环境的干预造成的。它们并不是自然现象。科学和技术不可避免地会致力于防止那种危险，但是首先它们也有助于产生这些危险。

我们必须面对以前不需要面对的危险情况，全球变暖只是这些危险中的一种。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也不管我们是如何有权有势或者一无所有，许多新危险和不确定性无不对我们产生影响。它们是与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包含了整体意义上的所有变迁，这也是本书的主题。科学和技术本身已经变得全球化了。我们可以认为，今天全世界正在工作的科学家比以往整个科学历史中所有的科学家还要多。但是，全球化还包含了许多其他方面。它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全球

电子经济中出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近期的发展)。在科学中,这里的风险是双重的。风险与革新紧密联系在一起。风险并不总会最小化,金融风险和企业风险的交叉正是全球化经济的推动力。

什么是全球化以及它是否是新生事物都是集中讨论的焦点。我在第一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其他的许多问题都有赖于它。然而,事实实际上非常清楚。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从西方开始,对美国政治和经济权力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其结果非常不平衡。但是,全球化并不仅仅是西方主导世界其他地方;它对美国产生影响也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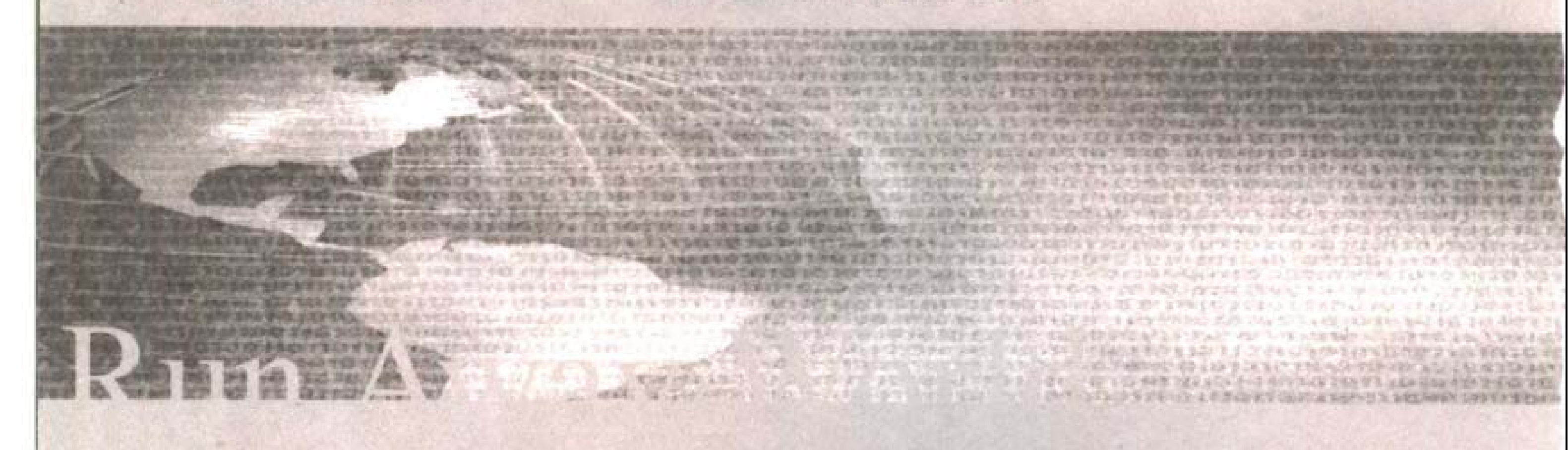
全球化也影响日常生活,而且它对世界性的事件也产生同样的影响。这就是这本书为什么也包括了对性、婚姻和家庭的扩展研究。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妇女正在要求比过去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大量的人正在加入劳动力大军中。全球化的这些方面至少与全球市场中出现的全球化同样重要。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它们有助于缓解影响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压力。传统家庭受到了威胁,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将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其他传统,如与宗教有关的传统,也正在经历重大变迁。原教旨

主义就起源于许多正在被破坏的传统。

21 世纪的战场将是原教旨主义与世界性的宽容进行竞争。在一个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信息和图像通常都被传遍全球，我们与那些与我们思维完全不同、生活完全不同的其他人通常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主义者欢迎并接受这种文化复杂性。原教旨主义者发现这非常令人烦恼而且认为这非常危险。无论是在宗教、种族认同还是民族主义方面，它们都躲进重建的和纯粹的传统中，而且经常陷入暴力中。

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世界主义观将取得胜利。接受文化多样性与民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民主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的扩张正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它也暴露了常见的民主结构即议会民主结构的局限性。我们需要使现存的制度进一步民主化，而且要以满足全球时代要求的方式进行民主化。我们从来不能成为我们自己历史的主人，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找到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法。

当代西方学界主流权威力作
公共管理硕士（MPA）必读名篇经典



本丛书收录20世纪末期以来当代西方学界公认的权威之作。文章所涉及的理论和观点，均代表西方主流观点，它们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并预示了这些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值得有志于学术创新的学者和关注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读者认真一读，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采取对应之策。

丛书策划　许志锐 林学勤
丛书主编　俞可平

内容简介

吉登斯是目前英国公认的最有影响的学者，其30多部著作构成了吉氏庞大的理论体系。本书是其最深入浅出的一本，但对公众的影响也是最大的。本书全文在BBC著名的莱思讲座上发表过。该书没有从单一的经济角度探讨全球化问题，而是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角度对全球化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生动地论述了不断增长的全球依赖性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影响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全书共五章，相继考察了伴随全球化而来的风险、传统、家庭以及民主这些人人关心的普遍性问题，告诉人们应当如何适应正在被全球化完全改变着的新的现实生活。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反响，《金融时报》称它“充满了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何去何从的深刻洞见”，《纽约客》则认为该书简直就是“一座知识的电站”。

责任编辑：许志锐
常务编辑：朱卫东
封面设计：田　晗

作者简介

安东尼·吉登斯，英国著名学者，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曾任英国布莱尔首相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顾问，至今出版著作30余部。吉登斯近年来发表的《现代性的后果》（1989）、《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亲密关系的转型》（1992）、《超越左与右》（1994）、《为社会学辩护》（1996）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1998）等著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他的著作已被译成22种语言，其主要著作大都已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此外，专门对吉登斯的著作进行研究的书籍就达十种之多，其中还有一部四卷本的研究专著。1996年，他成为BBC莱思讲座主讲人。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名著译丛》第一辑

《使民主运转起来》

［美］罗伯特D·帕特南

《没有政府的治理》

［美］詹姆斯N·罗西瑙

《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

［德］赖纳·特茨拉夫

目　录

第一章　全球化

我的一个朋友对中非农村生活进行研究。几年前，她第一次去了那个遥远偏僻的地方，在那里进行她的田野调查。在她到达的那一天，她被邀请去参加当地一个家庭的晚上招待和娱乐活动。她期待着发现这个偏远社区的传统娱乐方式。然而，其情形就如完全是在看录像《本能》(Basic Instinct)一样。而在那个时候，这部电影甚至还没有在伦敦电影院放映。

这样的小插曲揭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而且它们所揭示的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这不仅仅是人们在他们现存的生活方式中增加了现代工具的问题,如录像、电视、个人电脑等等。我们生活在转型变迁的世界中,我们所做的每一方面几乎都受到了影响。无论好坏与否,我们正在迈人一种全球秩序中,尽管没有人完全理解,但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在产生影响。

全球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或者华丽的辞藻。但是,世纪末的任何一个想要理解我们将来的人绝对不能忽视它。我去过国外许多地方演讲。最近我所去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在热烈讨论全球化问题的。在法国,这个词就是 mondialisation。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这个词是 Globalizacion。德国人却念作 Globalisierung。

这个术语的全球传播就充分表明了这个词所指的发展的含义。每一个商业领袖都谈论它。没有一次政治演讲是完全不涉及它的。然而,即使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这个词在学术界或日常语言中被普遍使用,因为它已经无处不在了。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词突然出现的普遍性而对全球化观念的意义总是不清楚而感到吃惊,或者对学

术界已经开始反对它而感到诧异。全球化与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这样一个主题有关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体现在哪些方面，而且这种观念真的有效吗？在过去几年出现的有关全球化的争论中，不同的思想家持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些人对整个事情持怀疑态度。我称他们是怀疑论者。

怀疑论者认为，所有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只是一种谈论而已。无论它有什么好处，无论它进行什么试验也不管它产生什么忧患，全球经济并不会与以前存在的经济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这个世界仍然像多年来一样地运转。

怀疑论者认为，大多数国家从对外贸易中只获得很小的收益。而且，大量的经济贸易都是在地区之间进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世界范围内。例如，欧盟国家主要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贸易。其他主要的贸易区，如亚太贸易区或者北美贸易区，情形也是如此。

另外有些人持完全不同的观点。我把他们称为激进分子。激进分子认为，不仅全球化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它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被每一个角落感受到。他们认为，全球市场比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有

了大得多的发展,而且不受制于国家边界的影响了。国家已经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大部分主权,而政治家已经失去了他们影响事件的大部分能力。再也没有人尊敬政治领导人或者再也没有人对政治领导人所说的那些东西有太大的兴趣,这并不令人吃惊。民族国家的时代结束了。正如日本商业作家 Kenichi Ohmae 所说的,国家已经变成了"虚构的小说"。像 Ohmae 这样的作家们将 1998 年亚洲危机所遇到的经济困难看做是证实了全球化的真实性,虽然这是从其负面来观察的。

怀疑论者倾向于站在政治左翼一边,尤其是老左翼一边。因为如果这一切实质上是荒唐的,那么,政府仍然能够控制经济生活,而福利国家也仍将完整无缺。怀疑论者认为,全球化这个观念只是那些希望拆除福利体制、减少国家开支的自由市场主义者所散布的一种意识形态。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充其量只是退回到了一个多世纪前的世界。19 世纪晚期已经有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那时有着大量的贸易,包括货币贸易。

那么,在这场争论中,谁是对的?我认为,激进派是对的。今天世界贸易的水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而且涉及的商品和服务范围也要广得多。

但是,最大的差异在于金融和资本流动水平。现在的货币已经发展为电子货币(这种货币只表现为计算机中的数字),这使得以前的世界经济无法与当前相比。

在新的全球电子经济中,基金管理者、银行、公司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投资者们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他们都能将大量的资本从世界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能够动摇似乎坚如磐石的经济,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世界金融贸易量通常是以美元来计算的。100万美元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笔巨资。如果以1叠100美元的钞票来测量,100万美元就是8英寸高。10亿美元,换句话说也就是1000个百万美元,叠起来的话将比圣保罗教堂还要高。1万亿美元,也就是100万个100万美元,将超过120英里高,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20倍。

然而,现在,每天全球货币市场的营业额远不止1万亿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这种营业额就有了大规模增加,更不用说更遥远的过去了。无论我们口袋里或者银行账户中是哪一种货币,其价值都根据货币市场的波动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因此,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正如我们经历的那

样，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然而，我并不认为，怀疑论者或者激进分子已经正确地理解了什么是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几乎都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全球化这一现象。这是一个错误。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首先受到通讯系统发展的影响，通讯系统的发展只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

在19世纪中期，一位马萨诸塞人像画家塞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第一个通过电报将“上帝做了什么?”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同时，他开创了世界史的新阶段。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信息不需要人带着它才能够被传递出去的。然而，卫星通讯的出现标志着对过去的巨大突破。第一颗商业卫星只是在1969年发射的。现在，已经有200多颗那样的卫星发射到天空，每一颗都承载了大量信息。即时通讯第一次从世界的这一端传递到另一端成为了可能。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地与卫星发射结合起来的其他类型的电子通讯也加速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才出现了专门的跨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电缆。第一条这样的电缆所承载的声音线路不超过100条，而今天的却能承载100多万条。

在1999年2月1日，也就是在摩尔斯发明他的电码系统之后的150年，摩尔斯电码最终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作为一种海洋通讯手段，它被终止使用了。取代它的是使用卫星技术的通讯系统，借着这种通讯系统，遇难中的船只能够立刻被查明。不久前，大多数国家都准备好了这种转变。例如，1997年，法国在他们的地区水域中停止使用摩尔斯代码，随着法国的繁荣，他们停止使用这种代码："通知所有的人。这是我们永久的沉默之前的最后一声呐喊。"

即时电子通讯不仅仅是新闻或信息传递的更快捷方式。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结构，无论对富的还是穷的都是一样。当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形象比我们邻居的长相对我们来说还更为熟悉的时候，我们日常经历的性质就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

曼德拉是一个全球知名人物，而其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新通讯技术的产物。随着每一次革新浪潮的出现，媒体技术的延伸不断增长。美国的半导体花了40年的时间获得了5000万的听众。在引入个人电脑15年之后，个人电脑就有了相同数量的用户。在个人电脑被使用之后，5000万美国人只需

要花4年的时间就均能使用因特网。

把全球化看作与庞大体系如世界金融秩序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全球化不仅是指什么是“在那以外”、什么是遥远偏僻以及什么是远离个人的。它也是一种“在其中”的现象,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亲密的个人方面。例如,正在许多国家进行的关于家庭价值的争论似乎可能从全球化的影响中消除出去。其实并不如此。尤其是当妇女要求更大的平等时,世界许多地方的传统家庭系统正在发生变化或者受到影响。只要我们从历史纪录中就能够知道,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社会,妇女取得了与男人接近的平等地位。这是日常生活真正的全球性革命,从工作到政治领域,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它产生的结果。

因此,全球化是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且这些过程是以一种矛盾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运作的。大多数人将全球化看作是地方社区和国家对全球的“推进”力量或者影响。这的确是它带来的后果之一。国家的确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某些经济力量。然而,它也产生了一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全球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而且也产生向下的推力,给地方独立带来了新的压力。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很好地描述了这一

点。他认为，国家不仅变得太小以至于无法解决大问题，而且也变得太大以至于无法解决小问题。

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地方文化认同的复兴的理由。例如，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苏格兰人想要在英国获得更多的独立，或者为什么魁北克会发生强烈的分裂主义运动，只从他们的文化历史中是找不到答案的。随着更古老的民族国家的力量的减弱，地方民族主义也应全球化倾向而出现了。

全球化产生了国家范围内和国家之间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区。香港经济区、意大利北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的硅谷都是这样的例子。巴塞罗那区也是这样。西班牙北部的巴塞罗那周围的地区延伸到了法国。巴塞罗那所处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与欧盟紧密结合在一起。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一部分，然而看起来也是向外联系和发展的。

这些变化是由许多因素推动产生的，一些是结构性的，另一些是更具体的和历史的因素。经济影响尤其是全球金融系统当然是其中的推动力。然而，它们与自然力量不同。它们受到技术、文化传播以及政府解放并对其国家经济解除管制的决定等的影响。

苏联的解体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些发展的作用，

因为再也没有一个重要的国家集团处在全球化范围的外面了。它的解体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全球化解释了苏联为什么会以及如何走向它的终结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增长率方面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可与西方相比较的。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很快落在了后面。由于苏联共产党对国营企业和重工业过分重视，他们无法在全球电子经济中竞争。

苏联和东欧政权无法阻止人们对西方广播和电视的接收。电视在1989年革命中起着直接的作用，这次革命被人们恰当地称为第一次“电视革命”。发生在一个国家的街头抗议被其他国家的电视观众所观看，然后他们自己也会走上街头。

当然，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对许多生活在欧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来说，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国化，因为美国现在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秩序中占据主导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中，许多都是美国的，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美国有线新闻等。

大部分大型跨国公司也都建立在美国。这些公司并不都来自富国，也不是来自世界上较穷的地区。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人主要将这看作是工业化北

半球(industrial North)的事,在这里,南部的发展中国家不起什么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可以看作是破坏了地区文化、扩大了世界不平等并且恶化了许多穷困地区的状况。有些人认为,全球化创造了许多胜者和败者,有些人暴富了起来,而大多数人陷入了悲惨绝望的生活中。

的确,统计数字令人非常沮丧。从1989年至1998年之间,全世界最穷的1/5的人口占全球收入的份额已经从2.3%下降到1.4%。另一方面,最富的1/5人口所占的比例却上升了。在撒哈拉南部非洲,20个国家人均收入比20世纪70年代晚期还要低。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安全设备和环境规则很少或者几乎就不存在。一些跨国公司在那里销售在工业国家中被控制或者被禁止销售的商品,如劣质药品、破坏性的杀虫剂和焦油及尼古丁含量高的香烟等。人们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全球掠夺。

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加上与之相关的生态环境危险是全世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然而,这不能只归罪于富人。我基本上认为,今天的全球化只是一定程度上的西化。与较穷的国家相比较,西方国家以及更笼统地说的工业国家当然仍然对全世界

事务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但是,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无中心化,不受任何国家集团的控制,也很少受大公司的控制。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在西方国家和在其他地方感觉差不多。

对于影响政府本身性质的全球金融系统及社会变迁来说,情况的确如此。所谓的“反殖民化”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反殖民化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的发展产生影响。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如洛杉矶的拉丁化、印度的全球取向的高技术区的出现以及巴西电视节目卖给葡萄牙等。

全球化是一种促进普通商品的力量吗?考虑到这个现象的复杂性,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来回答。问这个问题的人以及认为全球化导致世界不平等不断加深的人通常是从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的角度来考虑的。现在,自由贸易明显不是一种纯粹的利益。当它涉及欠发达国家时尤其如此。一个国家或者某些地区开放进行自由贸易会削弱当地的生存经济。一个只依靠少数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地区非常容易受到价格变动以及技术变革的冲击。

贸易总是需要一套制度框架,其他形式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市场不能只依靠纯粹的经济手段来建立,某种经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向世界市场开放

必定取决于许多标准。然而,反对经济全球化而选择经济保护主义对于富裕国家和穷困国家来说同样都是一个错误的策略。保护主义在某些时候和在某些国家可能是一种必需的策略。例如,我认为,马来西亚在 1998 年引入控制手段阻止资金大量外流就是正确的。但是,长期的保护主义形式将无助于贫穷国家的发展,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将产生敌对的贸易集团。

关于我一开始提到的全球化的争论已经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含义上面。民族国家以及国家政治领导人仍然非常强大吗?或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否逐渐变得与塑造这个世界的力量毫无关系呢?民族国家的确仍然非常强大而且政治领导人在世界上也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同时,我们可以看见,民族国家正在被重塑。民族经济政策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认同,现在,旧有的地缘政治学正逐渐过时。我认为,尽管这个观点还存在争议,但是,随着冷战的消融,大部分国家不再有敌人了。谁是英国、法国或者巴西的敌人呢?科索沃战争并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它是旧形式的地方民族主义与受伦理驱动的新干涉主义之间的冲突。

今天,国家面临的是风险和危险,而不是敌人,这二者在性质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样的观点不仅仅能够用来评论国家。在每一个地方,我们能够看见,许多制度从外表看与过去完全相同而且有着相同的名字,但是其实质内容却完全不同。我们继续谈论国家、家庭、工作、传统和自然,就好像它们与过去完全一样。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外表还在,但实质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不但发生在美国、英国或者法国,而且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它们就是我所称的"外壳制度"(shell institutions)。它们是一些已经变得不能充分完成它们被要求执行的任务的制度。

正如我在这章中所描述的变化和变迁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样,它们正在产生一种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即一个全球的世界性社会。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第一代人,现在我们只能模糊地看清它的轮廓。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它正在动摇我们现存的生活方式。至少在目前,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由集体的人类意志所推动产生的全球秩序。相反,它正以一种不固定的偶然的方式出现,同时带来一系列影响。

这个世界性社会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满了

焦虑,并被深深的分化所影响。我们中许多人都感受到许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我们还能够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它们吗?我认为,我们可以。我们所体验到的那种无能为力并不是个人失败的标志,而是反映出我们的制度无能为力。我们需要重构我们曾经有过的这些制度,或者建立全新的制度。全球化并不是我们今天生活的附属物。它是我们生活环境的转变。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风　　险

1998年7月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而作为一年，1998年可能是最热的一年。热浪浩劫肆虐了北半球的许多地方。例如，在以色列的埃拉特，温度几乎高达46摄氏度，同时，这个国家的水消费上升了40%。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温度还远不止这么高。这一年的头8个月，每一个月的温度都刷新了同期的纪录。然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在那些受热浪影响的许多地方中，有些以前从未见过雪的地

方又下了大雪。

像这样的温度变化是人类干预世界气候的结果吗？我们不敢肯定。但是，加上近年来飓风、台风和风暴不断增加，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可能性。作为全球工业发展的结果，我们可能改变了世界的气候，还大大破坏了地球的生存环境。我们不知道进一步的改变将带来什么结果，我们也不知道它们将带来什么危险。

我们认为，它们都与风险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风险这个概念来弄清这些问题。我希望说服你，使你相信，这个显然非常简单的概念却能说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

与以前的时代相比较，乍一看，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可能与我们现在的时代没有任何具体的关系。难道人们不是总需要面对他们受到的直接风险吗？欧洲中世纪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都非常糟糕而且寿命很短，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上较穷困地区的许多人的生活那样。

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些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就我能够发现的而言，在大多数其他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这个概念。在

16和17世纪,风险这个概念似乎已经有了,西方探险家们在开始他们的全世界航海时,他们第一次创造了这个概念。"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人传入英语中的,他们使用风险这个词来指代航行到未知的水域。换句话说,风险这个词最早主要有空间方面的含义。后来,它转向了时间方面,例如,它被使用在银行和投资方面主要是用来计算投资决策对借者和贷者可能带来的结果。因此,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

我要指出,风险这个概念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当某种结果是百分之百的确定时,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在冒风险。

有一个古老的笑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有一个人从100层高的摩天大楼的顶上跳下来。在他往下跳经过每一层的时候,在大楼里的人听见他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他这样说似乎是他正在进行风险计算,然而实际上,结果是已经确定了的。

传统文化中并没有风险概念,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个概念。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是不同的。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

好把将来看作是被征服或者被殖民的范围。风险暗示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亦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

所有以前的文化与文明包括世界上最伟大的早期文明如罗马或者传统中国都主要是存在于过去。他们使用运气、命运或者上帝的意志等概念,现在,我们倾向于用风险来代替这些概念。在传统文化中,如果某人遭遇了一件意外事故或者相反取得了某种成功,那么,这就是运气、命运,或者这就是上帝及其灵魂的意志。有些文化否认碰巧出现的机会。一个叫做 Azande 的非洲部落认为,当不幸降临某个人的时候,这就是巫术的结果。例如,如果一个人生病了,那是因为敌人一直在施行巫术或者邪法。

当然,这些观念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而完全消失。命运和宇宙论这些不可思议的观念和概念仍然有它的一席之地。但是,它们通常是作为迷信而继续存在,人们只是以某种尴尬的方式对它们半信半疑。人们只是用它们来进一步支持那些具有更加精确计算性质的决定。赌徒们包括那些股票投机者们大多数都有那种从心理上降低必定会遇见的不确定性的仪式。这同样适用于我们忍不住要去冒的风险,因为活着就是一件冒风险的事。人们仍然向占卜者咨

询，在他们一生的重要时刻就更是如此，这并不令人吃惊。

然而，接受风险也是激动和冒险的条件，你可以想像一些人从赌博、驾快车、性冒险主义或者投入到山车比赛场地等等冒险中所得到的快乐。而且，积极地接受风险也是现代经济中创造财富的精神源泉。

风险的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风险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这样的一个社会想要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会任由它走向宗教、传统或者自然界的反复无常。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与所有以前的经济体制不同就在于它对将来的态度。以前的市场企业形式是不规范的或者局部的。例如，商人的活动从来没有削弱传统文明的基本结构，所有的传统文明依然主要是农业的或者农村的。

通过计算将来的利润与成本也就是计算风险，现代资本主义将自己融入到作为连续过程的将来之中。直到15世纪欧洲复式簿记制度的发明，资本主义才做到了这一点，复式簿记使得精确记录钱如何用于赚更多的钱成为可能。当然，我们的确希望尽可能地减少许多风险如影响健康的风险。这就是为

什么从风险这个概念产生起就伴随了保险的出现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应该将这里的保险仅仅看作是私人的或者商业保险。福利国家的发展可以追溯到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糟糕的法律，它实质上是一种风险管理系统。这种体制的目的在于防止以前被认为是上帝安排的疾病、残疾、失业和终老这些灾难的。

保险是人们所能承受的准备冒的风险的底线。这就是安全的基础，这时，人们可以用对将来的积极运作来取代上天给予的命运。与风险观念一样，现代保险形式开始于航海方面。据记载，最早的海洋保险在16世纪。伦敦公司在1782年最早承担了海洋保险业务。在这之后不久，伦敦的 Lioyds 在新兴的保险产业中占据了领头的位置，这个第一的位置持续了两个世纪。

保险只是在我们认为可以被人类控制的将来中才是可能的。保险正是进行这种控制的手段之一。保险就是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实际上它依赖于风险以及人们对风险的态度。无论是私人保险还是国家福利体制的保险形式，提供保险的人实质上都只是在重新分配风险。如果某人取消了防止房屋被烧的火险，那么，风险就不会不存在。住户向保险公司支

付报酬,同时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风险的转移与交换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偶然特征。实际上,如果没有它,资本主义是无法想像的也是难以运转的。

因此,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但是,我想说,目前,风险具有一种新的特殊的重要性。风险被认为是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的一种方式。然而,事情并不是这样。我们控制将来的企图似乎对我们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它迫使我们寻找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不确定性。

解释上述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区分两种类型的风险。其中一种我称之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我想把这种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区分开来。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大多数环境风险,例如那些与全球变暖有关的环境问题就属于这一类。它们直接受到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不断加强的全球化的影响。

澄清上述两种风险之间的区别的最好办法如

下。我们可以认为，在所有传统文化中、在工业社会中以及直到今天，人类担心的都是来自外部的风险，如糟糕的收成、洪灾、瘟疫或者饥荒等。然而，在某个时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最近)，我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

在这里，进行担心的“我们”指的是谁？我认为，它指的是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我们是处在这个世界的较富或者较贫穷的地区。同时，富裕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许多更加“传统的”风险(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种风险，如因为糟糕的收成而造成的饥荒)在较贫穷的国家仍然存在，同时还交织着新风险。

我们的社会存在于自然结束之后。很明显，自然的结束并不是指物质世界或物理过程不再存在。它是指我们周围的物质环境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扰的某种方式的影响。过去曾经是自然的许多东西现在都不再完全是自然的了，尽管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确定某种过程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在1998年，中国发生了洪灾，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中国大多数河流的泛滥在历史上都是周期性发生的。这

年特殊的洪灾也是如此吗？还是受到了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呢？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这些洪灾的某些不同寻常的特征表明了它们的起因并不是完全自然的。

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并不只涉及自然——过去所涉及的多数是自然的。它还渗透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就拿婚姻和家庭来说吧，在工业国家，它们现在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全世界也是如此。两三代前，人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主要由传统和习俗决定的婚姻与自然状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当然是事实。然而，凡是在传统的处事方法正在消失的地方，由于婚姻和家庭制度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有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作为先锋的个人再度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即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他们都开始从风险的角度思考得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面临个人的将来，与过去相比，他们的将来越来越不可决定，其中充满了各种机会与风险。

正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扩张的时候，风险也变得危险重重。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风险观念的出现是与计算的可能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

多数保险形式是直接建立在这种联系的基础之上的。例如，每当某个人走入汽车的时候，人们就能够计算出这个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这是保险精算的预测——这是长期以来产生的可能性。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就不是这种情形。我们完全不知道风险的大小和程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直到很晚，我们也不能确切知道这种风险的大小。

不久前(1996年)正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十周年纪念。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故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威胁健康的潜在的灾难。英国发生过牛绵状脑病(BSE)，也就是所谓的疯牛病。从这种病对人类的影响角度来说，我们同样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目前，我们不能肯定将来的某个时间是否会有更多的人患上这种病。

我们还可以拿世界气候变迁为例。对这个领域非常精通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全球正在逐渐变暖，对此必须采取措施。然而，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统科学家们仍然认为，这个世界正处于全球变冷的阶段。原来用来证明全球变冷命题的相同证据现在又被用于支持全球变暖问题，如，热浪、寒冷时期这些不寻常的天气。全球正在变暖吗？它的

出现有人类的因素吗？也许吧，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确定，我们只能等待。

在这些环境中，有一种新的政治学的道德气候，在对散布谣言者（扰乱社会民心者）的谴责与掩饰之间的推力与拉力是这种道德气候的标志。如果任何人——政府官员、科学专家或研究人员——都正视这种风险，那么，他们一定会将这种风险揭示出来。它一定会被广泛宣传，因为人们一定会认为，这种风险是真的——人们肯定会对此小题大做。然而，如果真的小题大做，而这种风险又被证明非常小，那么，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就会被别人谴责成妖言惑众。

然而，假定权威们最初认定这种风险不是非常大，就像英国政府在对待被污染的牛肉事件时那样，政府首先就会说：我们得到了科学家的支持；根本不存在那么严重的风险，想吃牛肉的人可以毫不担心地继续吃牛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情被证明是另外一种情形，那么，权威们就会被谴责掩饰了实情。

事情甚至比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还更为复杂。荒谬的是，散布谣言对于减少我们面临的风险可能是必须的。然而，如果这种谣言真的减少了风险，那么，它就真的成了谣言。艾滋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政府和专家们使得公众非常重视与不安全的性有关的风险，这使得人们改变了他们的性行为。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的艾滋病并没有像原来预测的那样蔓延。这时，人们的反应是：你为什么这样吓唬我们？然而，正如我们从艾滋病不断扩展的全球蔓延中知道，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对的。

这种荒谬的事在当代社会中变成了常有的事，但是，我们却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方法来解决它。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在大部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中，是否存在风险甚至都可能会受到怀疑。我们不能预先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真的在散布谣言，什么时候又没散布谣言。

今天，我们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不同于早期时代。大约在两个世纪中，西方社会的科学起着一种传统的功能。科学知识被认为战胜了传统，但实际上科学知识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传统。科学知识是大多数人所尊重的东西，但是，对于人们的活动来说，它们是外在的、客观的。普通人“吸取了”专家们的观点。

科学和技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越多，持这种观点的人就越少。与过去的情况相比，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政府权威和政治家，现在都与科学技术

有着更多的积极关系。

我们不能完全“接受”科学家所提供的发现，主要是因为科学家们通常的看法都不统一，尤其在风险是被制造出来的情况下。而且，现在每一个人都认识到科学的动态特征。当某人决定吃什么、早餐吃什么、是喝无咖啡因的咖啡还是普通咖啡时，这个人就得在相互冲突的、可改变的科学技术信息环境下作出决定。

以红葡萄酒作为例子。以前人们认为红葡萄酒和其他的酒精饮料掺在一起喝有害于身体健康。然而，研究表明，喝适量的红葡萄酒可以防止心脏病。后来还发现，任何形式的酒都将有这种作用，但是，这种保护作用只出现在40岁以上的人中。谁知道以后的发现还将表明什么呢？

有人认为，防止出现被制造出来的风险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采取所谓的“预防原则”来限制责任。预防原则这个概念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德国，当时，德国正在开展生态学争论。简单地说，预防原则是指，即使存在不安全的科学证据，人们也必须对环境问题（也可以推及其他形式的风险）采取措施。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英国缺乏用于论证不对酸雨和其他污染问题采取行动的决定

性证据，几个欧洲国家还是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防止酸雨。

然而，作为解决风险和责任问题的方式，预防原则并不总是有用的甚或是可应用的。“接近自然”或者限制创新而不是促进创新这个原则并不总是可行的。原因就在于科技进步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变化的作用和反作用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基因改良食品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基因改良作物已经在世界上种植了3500万公顷，大约相当于英国面积的1.5倍。其中大部分种植于北美和中国。基因改良作物包括大豆、玉米、棉花和土豆。

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说明现在的自然界不是自然的了。真正的危险在于很多已知的和未知的东西，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显现出一种让我们惊奇的趋势。也许会有以前根本没有人预测得到的结果出现。比如人们食用的这些农作物会不会带来中长期的危害。总之，现在应用的大量的基因技术是非常新的，与以前的杂交等技术甚至有本质上的不同。

还有一种可能是，为增加虫害抵抗力而植入农作物的基因可能传播到其他的植物上——最终会形成“超级杂草”，反过来会对环境的生物多样性造成

威胁。

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一直存在压力,改良农作物的基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商业利益所驱动的,那么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它是不是合理的呢?即便这种禁止是行得通的,那也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过去曾广为采用的密集型农业现在肯定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它使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对环境造成了危害,但是我们并不能回到以前的更原始的农作方式,因为我们要养活着地球上所有的人口。而实行基因改良的农作物可以减少这些化学污染,反而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无论你怎么看,我们都要陷入一种危机处理的困难中。随着这些人为危机的扩展,政府不能认为这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政府之间应当多一些合作,尽管这些新型的危机并不会带来国家之间的边境问题。

然而对于我们每一位普通的个人来讲,也都不能无视这些新型危机的发生,或者说我们被动地等待着更为权威的科学证据。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应当就是否消费基因改良食品做出选择。这些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让人两难的选择,都已经深入了我们每天的生活。

下面我来谈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并且把我的观点阐述得更明确一些。我们所处的年代并不比以前更危险、更危机，但是危险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界。其中一些可以说是大灾难，比如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核裂变和全球经济崩溃。其他一些则对我们中的一些个体造成威胁，比如食物、药品甚至婚姻。

在我们的这种年代，必然要产生类似宗教复兴或者新时代哲学的思潮，也许是与科学相对的一种视角。由于生态方面的危机，对科学产生敌对态度，甚至进一步对其他的理性思想也采取敌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没有科学的分析手段，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到这些危机。然而，由于我们前面讲到的问题，我们与科学的关系也应当与以前有一些变化了。

我们现在尚且不能对一个国家甚至在全球的范围内的技术变化进行观察。如果我们能建立起有关科技变化及其产生的后果的正确舆论的话，在英国及其他地方发生的疯牛病或许就能够避免。对于科学技术的更为公开的处理方式并不一定会消除是公开还是隐藏的这种两难困境，但也许能使我们减少

一些更具破坏性的后果的发生。

最后,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消极地对待风险。风险总是要规避的,但是积极的冒险精神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充满创新的社会中最积极的因素。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在支持科学创新或者其他种类的变革中,可能应该表现得更为积极些,而不能过于谨慎。毕竟,"风险"一词(risk)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

第三章　传　　统

苏格兰人以最传统的方式庆祝他们国家的统一。男人们身穿短裙，每一个部落的短裙上的格子都不相同，仪式上少不了风笛的声音。苏格兰人想通过这些信息，对古老的礼节表现出他们的忠诚。这些仪式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

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同其他的苏格兰特点一样，这些特征的形成还都不很久远。比如短裙就是由来自兰开夏（Lancashire）的一名叫做托马斯·罗

林森(Thomas Rawlinson)的英格兰工业家发明的。正是他开始改变苏格兰高地的传统服装,并使之更便于工作的。

苏格兰短裙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目的并不是要保留历史久远的风俗,反过来,确实要把苏格兰人从农业转到工厂里去。短裙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什么民族服装。作为苏格兰大多数人的低地人,轻蔑地认为高地人的服装非常粗劣。类似地,现在人穿的各种格子的花式也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区分的,仅仅是由于聪明的裁缝从中看到了一块市场。

很多我们认为非常传统、来自很久以前的东西往往是在好几个世纪以后才形成的,其实它们远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古老。苏格兰裙子的故事来自于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和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的著名的《传统的起源》。他们在书中描述了各个国家的很多传统的由来,其中有些来自殖民地印度。

英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学调查,确认了印度宏伟的纪念碑并保存了印度的“遗产”。他们认为地方工艺正在减少和绝迹,所以,他们收集了很多工艺品陈列在博物馆里。例如,在1860年之前,印度士兵和英国人都穿西式制服。但是,英国人

认为,印度人必须看起来是印度人。统一的制服必须被修改成包括头巾、腰带和束腰外衣的衣服,这才被认为是“真正的”印度人。有些英国人发明的传统或者不完全由英国人发明的传统今天还可以在印度见到,当然有些在后来还是被废弃了。

传统和习俗是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们生活的素材和内容。然而,很明显,学者们和思想家们对这些传统和习俗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没完没了地讨论现代化和现代性,却没有人真正讨论传统。为写这一章,我翻阅了几十本英文的以“现代性”为题的学术著作。其中有我自己写的几本,但是,我发现具体论述传统的只有两本。

正是由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使传统有了坏名声。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霍尔巴赫(Holbach)男爵,他这样说:

先哲们已经使人们关注天堂的时间太久了,现在也该让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地球上来了。人们已经对难以令人置信的神学、荒谬的神话、不可捉摸的神秘事物以及平庸的礼仪等感到厌倦,也该让人类应用他们的智慧去研究大自然,去研究可理解的物体、能够感知的事实以及有用的知识。让人类去除那些愚蠢无用的狂想,而合理的想法和观

点不久就将自然而然地进入到那些永远都被认为注定是错误的人的头脑中。

很明显,霍尔巴赫从来没打算认真严肃地对待传统及其传统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他那里,传统只是遮蔽现代性的不好的一面,是可以轻易被抹除的不真实的结构。如果我们真正掌握了传统,那我们就不会将传统只看作是荒唐和愚蠢。"传统"一词有着古老的语言学起源。传统这个英文词起源于拉丁语 tradere 一词,它的意思是为保存某物而将该物传给另外一个人。Tradere 这个词最早被使用在罗马法中,它指的是继承法。从这一代传给下一代的财产被认为是交给下一代托管,继承人有义务保护和照管好它。

与苏格兰短裙和风笛不同,传统这个概念似乎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外在的表象再一次欺骗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传统"这个词实际上只是欧洲过去的两百年的产物。与我在前一章讨论的风险这个概念一样,在中世纪时代还根本不存在任何一般的传统概念。那时对这个词还没有任何必要,就是因为传统和习俗到处都是。

其实,传统这个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涉及前现代或非西方社会时，人们不应该使用它。然而，它确实表明，在对传统进行讨论时，我们应该更加小心。启蒙思想家将传统视作教条和无知，并努力为他们吸收新观念作辩护。

把我们自己从启蒙思想的偏见中解脱出来后，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传统”呢？我们可以从被发明的传统开始。霍布斯鲍姆和兰杰认为，被发明的传统和风俗都不是真实的。它们是被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被当作一种权力手段而使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和远去，它们也将不复存在。无论这种传统具有何种的连续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都将被证明是完全虚假的。

我将从头考察他们的这些观点。我认为，所有的传统都是被发明的。完全传统的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而且传统和习俗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发明出来。我们不应认为，有意识建构的传统只能存在于现代时期。更重要的是，无论传统是以故意的还是非故意的方式建构出来，传统总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国王、君主、牧师以及其他人一直都发明传统来适应自己并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

认为传统不受变迁影响，这是很荒诞的。传统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演化，而且可能会突然改变或转化。如果说发明和重新改造传统这种说法可以的话，那我想说，传统是被发明的和不断被重新改造的。

当然，有些传统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如那些与大宗教有关的传统。例如，几乎所有的穆斯林信徒都坚持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而且可以查证，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也已经维持存在了几百年。然而，无论这种宗教具有怎样的连续性，它的教义如何被解释以及如何被人们遵从等方面还是发生了许多变化，甚至出现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纯粹的传统。与所有其他的世界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吸收了各种文化资源，也就是说，吸收了其他的传统。从更总体的角度来说，奥托曼帝国也同样经历了与阿拉伯、波斯、希腊、罗马、柏柏尔、土耳其和印度等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时间。

但是，如果由于一套既定的符号或实践是传统的，就认为它们一定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那就完全错了。英国每年都要广播的君主发表的圣诞节讲话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然而，它只是从1932年开始的。时间的持久性并不是定义传统的关键特征，也不是定义越来越与传统混合在一起的风俗习

惯的主要要素。构成传统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仪式和重复。传统总是群体、社区或者集体所具有的特征。个体可能遵循传统和习俗，但传统并不像习惯一样成为个体行为的特征。

传统的与众不同表现在它界定的是一种事实。如果有些人遵循一种传统实践，人们就不一定会去问及关于取代这种传统实践的问题。无论传统可能出现的变化有多大，传统还是为能够基本上不受质疑的行为提供了框架。传统通常有它的护卫士，如先哲、牧师和圣人。护卫士们与专家并不完全相同。传统的护卫士之所以获得它们的地位和权力，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够解释传统的仪式真理。只有他们才能解释公共仪式中所涉及的圣文或者其他符号的真正意义。

启蒙运动开始破坏了传统的权威，但它只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在大多数的现代欧洲国家，传统仍然长期保持着强大，而且在世界其他的大部分地区，传统甚至更根深蒂固。许多传统都被重新改造，还有一些是刚刚建立的。有些社会采取具体的措施保护或者适应古老的传统。毕竟，这基本上是保守的哲学家们曾经所从事的和正在从事的。传统也许是保守主义的最基本的概念，因为保守主义

者认为传统包含着被存储起来的智慧。

工业国家维持传统的进一步的理由在于现代性所标志的变迁主要局限于公共制度，尤其是政府和经济。在生活的许多其他领域包括日常生活，传统的处事方法倾向于坚持下去或者被重新建立起来。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在现代性和传统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例如，在大多数国家，家庭、性以及两性之间的分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传统与习俗。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今天正在出现两个基本的变迁。在西方国家，不仅公共制度而且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传统。而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正变得非传统化（detraditionalized）。正如我以前就提到的，我认为这是正在出现的全球社会的核心和关键。

这是一个存在于自然终结以后的社会。换句话说，物质世界几乎再也没有什么方面是自然的，没有什么方面不受人类干预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存在于传统终结以后的社会。传统的终结并不一定意味着像启蒙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的传统消失。相反，传统以不同的形式到处继续繁荣发展。但是以传统方式存在的传统越来越少。传统方式是指通过传统的仪式和符号来定义传统活动，通过传统对真理的内

在要求来定义传统。

现代性并不局限于某一地理范围但又使自身感觉具有全球性的这个世界已经因为传统而出现了许多后果。传统和科学有时以一种奇特而有趣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例如，人们越来越多地讨论1995年发生在印度的事件就是如此，那时，一些地方的印度教神祠里的神竟然喝牛奶。也就在同一天，不仅在印度而且在全世界，几百万人给神像供奉了牛奶。一位叫做丹尼斯·维达尔(Denis Vidal)的人类学家描写了这种现象，他写道：

> 印度教通过在世界上有印度人居住的每一个国家表现他们自己的同时，印度教的神有可能也会踏着全球化时代的节拍成功地完成第一个奇迹。

同样有趣的是，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都普遍认为，需要科学实验来证明这个奇迹。科学应服务于信仰。

在那个例子中的传统不仅仍然活着，而且它又复活了。然而，传统也经常屈服于现代性，在世界上这样的现象正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来。那些失去了内容的传统或者商业化了的传统或者变成了遗产或

者成了在机场商店可以购买到的粗劣工艺品或小玩艺。随着遗产业的发展，遗产变成了被重新包装成可观赏的传统。旅游地被刷新的建筑可能看起来辉煌，而且这种刷新甚至可能真实到每一个细节。但是，这种因此而受到保护的遗产被割断了与传统的生命血液的联系，即割断了与日常生活经历的联系。

我认为，认识到社会需要传统，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应该废弃传统的启蒙思想。传统是必需的，而且总是应该坚持，因为它们给生活予连续性并形成生活。拿学术生活作例子来说，学术圈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传统的范围内工作。甚至作为一个整体的每一门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或者哲学都有自己的传统。原因在于没有人能够以一种完全折衷的方式工作。没有学术传统，思想或观念就没有了方向。

然而，正是部分的学术生活不断地开发出那些传统的限制，并在它们之间形成积极的交流。传统可能完全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而受到保护，而且这种非传统的方式可能就是它的未来。仪式、典礼和重复都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有些被大多数组织如政府等理解并遵照它从事。从传统本身的内部仪式的角度或者与其他传统和处事方式相比较而言的角

度，由于传统被有效地证明是合理的，传统就将继续被坚持。

对宗教传统来说也是如此。宗教通常与宗教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信仰是转变成信仰的一种情感飞跃。然而，在全球各地，与自己思维不同的其他人发生经常联系的人比以前越来越多。他们至少以一种毫不怀疑的方式证明他们的信念对他们自己和对别人都是最合理的。在非传统化的社会中，坚持宗教仪式和惯例的过程中必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事实也正好如此。

然而，当传统的作用发生变化时，新的动力就被引入我们的生活。这些动力一方面可以被归结为行动的自主性和强迫性之间的推拉力，另一方面可以归结为世界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推拉力。凡是传统已经失去的地方，我们不得不以一种更开放和更能动的方式生活。自主和自由使得可以以更加开放的讨论和对话取代传统的隐藏力量。但是，这些自由同时也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生活在自然与传统的另一面的一个社会（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基本上就是这样）与其他社会一样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决策。决策的负面是成瘾（addiction）和强制的出现。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但也令人烦恼的某些事情

在这里将继续下去。这个问题主要局限于发达国家,但是在其他地方的越来越多的富裕群体中也逐渐可以看到。我正在讨论的是成瘾这个观念和事实的传播与蔓延。成瘾观念最初只是应用于酒精中毒和吸毒。但是,现在活动的任何领域都可能受到它的侵袭和影响。人们可能沉溺于工作、锻炼、饮食、性甚至爱情。其原因在于,这些活动以及生活中的其他活动比以前受到传统和风俗的影响越来越少。

与传统一样,成瘾指的是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而且与重复(repetition)在传统中的作用一样,重复在成瘾中也起着关键的作用。被讨论的"过去"是个体的,而不是集体的,而重复是因焦虑而引起的。我把成瘾看作是被冻结的自主。每一种传统化的环境比以前提供了越来越大的行动自由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关于人类摆脱过去的束缚。当因自主而带来的选择受到焦虑破坏时,成瘾就开始出现。在传统中,通过共享的集体信念和情感,过去决定着现在。瘾也受到过去的影响,但这是因为人们不能摆脱自己所自由选择的生活习惯。

当传统和习俗的影响在全球层次上减小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我们的自我感觉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更传统的情况下,自我感主要是通过社区中

个体的社会位置的稳定性来维持的。在传统丧失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盛行的地方，自我就不是自由的。自我认同不得不在一种比以前更主动的基础上被建立和重新被建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各种治疗和咨询在西方国家变得如此流行。当弗洛伊德开创现代心理分析学的时候，他认为他正在创立一种治疗精神病的科学方法。然而，在一种非传统化文化的早期阶段，实际上他所做的是在建立一种恢复自我认同的方法。

毕竟，心理分析中所出现的是个体为了给将来创造更多的自主而重温他或她的过去。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自助团体也同样如此。例如，在酒鬼匿名会议（Alcoholics Anonymous meeting）上，个人叙述了他们的生活史并在他们表达希望改变他们的状况时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他们通过改写他们的生活情节而从成瘾中恢复过来。

成瘾与自主之间的斗争是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另一个表现就是世界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冲突。人们可能认为，原教旨主义总是存在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原教旨主义是受到全球化影响而产生的。这个词本身产生于 20 世纪初，那时，它指的是美国某些新教徒尤其是那些拒绝达尔文的教

徒的信仰。然而，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在牛津英文大辞典中也没有“原教旨主义”这个词条。只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才渐渐成了一个流行的新词。

原教旨主义既不同于狂热盲信(fanaticism)也不同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原教旨主义者提倡回到基本的圣经和经文本身，认为应该逐字逐句地阅读经文。他们还认为，被应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教义应该来源于这种阅读。原教旨主义给原来的传统护卫士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价值，因为只有传统的护卫士才有机会接近经文的“确切含义”。牧师等神职人员或者其他有特权的解释者因此获得世俗和宗教权力。它们有可能直接取代政府的统治(伊朗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者与政党共同执政。

原教旨主义是一个有争议的词，因为许多被别人称作原教旨主义者的人并不接受这个词。如果是这样，我们能够给这个词一个客观的含义吗？我认为是可以的，而且我以下列方式给它一个定义：原教旨主义就是被围攻的传统。在寻求理性的全球化的世界中，原教旨主义就是以传统的方式受到防卫的传统(即指仪式真理)。因此，原教旨主义与宗教信仰或者其他什么信仰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真正与

之有关系的是信仰的真理如何受到防卫或者被坚持的。

原教旨主义指的并不是人们所相信的东西本身(如传统),而是为什么他们相信它或者他们如何为它辩护的。原教旨主义并不限于宗教方面。原教旨主义也并不主要是指更传统的文化对西方化的抵制,即拒绝西方的颓废。原教旨主义可以在各种传统的土壤中发展形成。原教旨主义就是对世界的和平与持续所依赖的对话的拒绝,而且从无歧见和异议。

原教旨主义既是对全球化做出反映的产物也是利用全球化的产物。几乎每一个地方的原教旨主义者团体都广泛使用新的交流技术。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在伊朗上台执政之前,他灌制过他的教义的录音磁带。印度军队也广泛使用英特网和电子邮件来建立"印度认同感"。

我认为,无论原教旨主义采取什么形式,如宗教的、伦理的、民族主义的或者直接的政治形式,把原教旨主义看作是有问题的都是正确的。原教旨主义有可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世界主义价值观的敌人。

然而,原教旨主义并不是全球化的现代性的对

立面,只是给全球现代性带来很多问题。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宗教的世界中?对于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能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世界主义者(我也算一个)不得不承认,宽容与对话本身可以受到普世价值的引导。

我们都需要能够监督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和争吵的道德责任。我们应该在道德价值观发展较差或者受到威胁的地方增加对这些价值观的积极保护。世界主义的道德本身需要有热情和激情的驱动。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值得我们为之牺牲的东西,那我们中就没有一个人会获得可以为之而活的东西。

第四章　家　　庭

在世界上所有的变化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些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在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姻和家庭等方面。在如何看待我们自身以及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观念上已经发生了全球性的变革。这场变革随着地域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同时还面临这样那样的阻力。

与从其他的角度看待这个失控的世界一样，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很难弄清楚利益与问题究竟是什

么比例。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些可能是最困难和最令人困惑的变革。我们往往会在较困难的问题面前退却,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很难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很好地合作。但是我们不能选择退却,因为这些变革一直深入到我们情感生活的深处。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男女平等、性解放和未来的家庭模式进行着深入的讨论。如果有些地方没有进行公开的争论,那往往是由于当局或者所谓的正统派别的压制。在很多时候,这些争论是国家性的或者区域性的,与这些争论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影响范围一样。政治家们或者那些政治派别应该会感觉到,一旦家庭制度发生改变,一旦离婚变得更困难些或者更容易些,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但是,影响个人感情的变革往往会超出国界的范畴,即便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我们发现了一些所有地方都在发生的共同的趋势,只不过是由于当地的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在中国,有很多关于保护家庭的呼声。在很多西方国家,关于这个问题还争论得非常尖锐。家庭既是现代与传统斗争的战场也是二者斗争的体现。比起其他的事物来讲,家庭中或许会有更多以往的

影子。政治家用通常的办法看待婚姻破裂问题，他们希望能恢复一些传统家庭的东西。

“传统的家庭”包含着很多含义，在过去的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文化中，存在过各种各样的家庭和血缘体系，中国的家庭就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里，包办婚姻从来就没有像印度这么严重。然而，在一些非现代化的文化中，家庭在方方面面一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传统的家庭首先是一个经济单位。收获的农作物一般是属于整个家庭的，而对于贵族们来说，财产的转移则是婚姻最基本的要素。在中世纪的欧洲，婚姻既不是两性感情的结果，也不是爱情产生的温床。就像法国历史学家乔治·达比(Duby)所说，中世纪的婚姻没有任何“冲动、热情和幻想”。

传统的家庭从一开始就存在男女的不平等现象。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在欧洲，女人是她们丈夫或父亲的财产，就像法定的财产一样。两性的不平等也体现在两性生活中。性的双重标准是与传宗接代相联系的。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男人们都拥有情人、情妇或者妓女。富人与女佣人之间也往往有说不清的事情。但是男人则要求他们妻子都是贤妻良母，女孩子的美德是贞节，而妻子则

要从一而终。

在传统的家庭中,不光是妇女没有权力,孩子们的地位也是低下的。利用法律保障儿童的权力从历史角度看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在现代社会以前,或者在一些传统的文化中,人们并不是为了照顾孩子而照顾孩子,或者也不是为了父母本身的意愿而抚养孩子。甚至有人说小孩子并不被当作人来看待。并不是父母不爱它们的孩子,但是抚养孩子更多的是出于对整个家庭经济的贡献,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且,孩子的死亡率非常的高,在17世纪的欧洲和美洲,几乎有1/4的孩子不到1岁时就死了,甚至接近50%的孩子活不到10岁。

除了那些贵族和经营群体以外,传统家庭中的两性生活的主要目的就是生儿育女。这是传统和自然的双重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避孕措施,性生活对于妇女来讲往往就意味着生育。在许多传统的社会里,包括一直到本世纪初期的欧洲,一位妇女一生中往往要怀孕10次以上。

由于上述原因,传统的妇道观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性的双重标准往往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的发明,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曾是所有非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性的双重标准对于女性

来讲意味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角色——一方面是贞节，另一方面则是放荡。在很多文化中，男性在性方面的放荡不羁被认为是一种男子汉的气质。邦德(James Bond)就由于他的强健和性感而获得了崇拜。而女性如果在性方面比较开放的话，无论她对某些大人物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都不会被社会接受。

传统和自然的混合标准同样也主导着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人类学的研究显示，同性恋，至少是男性同性恋，在很多社会里，往往是人们所能够容忍的，甚至是赞同的，而不是被禁止。比如有些社会里，人们利用性监护的方式鼓励男孩子与年长的男子发生同性关系。这种现象会一直持续到男孩子订婚或者结婚为止。拒绝接受同性恋的社会一般谴责这是一种有悖自然的行为。西方文化中对同性恋的敌对达到了极端，就在半个世纪以前，同性恋还被认为是一种性错乱行为，并且这种观点被写进了心理学教科书。

当然，很多人仍然对同性恋持反对态度，对于女性的双重标准也还存在，持这种观点的有女人也有男人。然而，最近几十年，西方的性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性生活与生育后代被看成是独立的两件事情。性行为第一次被当作是一种可以研

究、培育、改变的对象。性关系在过去是被认为局限在婚姻或者合法的范畴内，而现在似乎与这些没有直接联系。我们还应该看到，人们对于同性恋也越来越接受，而不再仅仅把它当作一种性自由来容忍。这些现象就是性行为和生育后代相分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人们定义性的不满足也不再局限于异性性行为。

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支持者们所称道的传统家庭实际上只是家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最新的、变化中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仍然比较低，而离婚仍然是一种羞耻的行为，尤其是对于女性。然而到了现在，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法律上，男性和女性比以往更加平等了，家庭不再是一个经济单位，以浪漫的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已经取代了过去经济合同式的婚姻。从此，家庭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社会与社会纵然有细节上的差别，但在工业化国家里几乎处处都出现了相同的发展趋势。只有少数人至今还生活在所谓的标准的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里——父母与他们婚姻的产物——所有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在外面挣钱养家。在一些国家，有1/3以上的孩子属于婚外生育，

独身的比例也上升得很快，而且看来会继续上升。在美国、英国等大多数社会里，结婚仍然是非常平常的，但这些国家被恰当地称为高离婚率高结婚率的社会。相反地，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存在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两人一起生活，而且还与儿女们一起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结婚。在美国和欧洲，18 至 35 岁的女性中有高达 1/4 的人表示她们不打算生育，她们似乎已经确定这样做了。

在所有的国家，还继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家庭形式。在美国，许多人，尤其是新移民，依然生活在传统的信念里。然而，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都随着性伴同居或者同居的开始而发生变化。婚姻和家庭也变成了我在第一章中说到的空壳状态：名称都还没有变，但是内在的基本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家庭里，夫妇仅仅是家庭里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与孩子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是在每日社会生活中与之相当甚至更重要的方面。今天，结了婚或者没结婚的夫妇是家庭的核心所在。夫妇成为家庭的核心是由于家庭的经济角色越来越小，而爱情或者说爱情加上性的相互吸引，已经成了婚姻纽带中最基本的因素。

夫妇关系一旦建立，就会有它与众不同的经历。

它是一个基于感情联系或者亲密关系(intimacy)的单位。亲密关系这个词,与我在本书中讨论过的其他的概念一样,似乎非常古老,但实际上有非常新的含义。以前的婚姻从来就不是基于亲密和感情关系的。当然这对一个美好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但以前它并不是婚姻的基础。而对于现在的夫妇,它确是最基本的东西。这种关系成为开始建立联系的手段,并成为继续下去的首要理由。

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同居与没有同居(couple and uncouple)"比"婚姻和家庭"可以更准确地描述对于个人生活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讲,"你们有明确的关系了吗(in a relationship)?"是一个比"你结婚了么?"更为重要的问题。明确关系是一个非常新的说法。在20世纪60年代还没有人这么说。他们不必,也不会用亲密关系这种词来表达。婚姻在那时候是一种承诺,包办婚姻就是这样。

在传统的家庭里,婚姻有点像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婚姻都被定义成生活的一个阶段,而且是绝大多数人都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结婚的话,将被称为老处女或单身汉,其中都含有嘲笑或者轻蔑的意思。

尽管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婚姻还仍旧是一种

通常的状态,但对于多数人来讲,婚姻的含义却有了或多或少的本质变化。婚姻意味着夫妇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而且实际上对这种稳定是一种保障,因为有一种公开声明的含义。但是,不再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主要的根据和保障。

在这里面,孩子的位置就显得很有趣,有时也很尴尬。经过几代人的变化,我们对于儿童以及儿童保护的观念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我们现在如此地宠爱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孩子越来越少,而且由于做出生育孩子的决定也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在传统家庭里,孩子是一种经济收益。而相反在现在的西方国家里,一个孩子对父母来讲意味着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现在生孩子与以往相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现在主要是由于生理和感情上的需要。我们对于离婚对孩子产生的影响的担心,对于单亲家庭的存在产生的担忧,都是在我们对于保护和养育儿童的期望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产生的。

感情联系和亲密关系正在取代以往的人们生活的联系纽带。有三个方面的原因:性爱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友情关系。

在解释这个观点时我想用“纯粹关系”一词。我想用它来表达一种基于感情交流的关系,这样交流

的结果就是关系赖以继续的基础。我不是指一种纯粹的性的关系，我也不是指任何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关系。在这里，我指的是一个抽象的说法，通过它来理解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我上面说到的三种关系——性爱关系、父母孩子关系、友情关系——都越来越符合这种关系模型。感情关系或者说亲密关系正在成为这些关系的关键所在。

与传统的社会关系相比，纯粹关系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动力。它基于一个积极的信任过程——人与人之间是开放的。开放是亲密关系中最基本的方面。纯粹关系中隐藏着民主的意思。当我开始研究亲密关系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精神治疗学和自强自立行为的文献。我很震惊地看到，有很多我不相信的事情已经被广泛地关注和指出。如果用一个治疗学家看待一个良好的关系（无论是上面说到的三层中哪一层次的关系）的方法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令人震惊的类似公众民主的概念。

良好的关系，不用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词汇，平时的大多数关系不可能达到甚至不能接近。我也不是暗示，我们的配偶之间、爱人之间、与孩子和朋友之间平时没有混乱、冲突等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

但是民主这个词本身就是理想化的,与现实也有相当远的距离。

良好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每一方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这种关系中,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希望他人有最好的结果。纯粹关系是建立在沟通之上的,所以理解他人的观点是最基本的事情。谈话,或者说对话,是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如果人们彼此之间没有隐藏太多东西,也就是相互信任的话,关系就会起到最大的作用。人们应该努力达到这种信任,而不应当认为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最后,良好的关系应当是远离官僚权利、威胁和暴力的。

所有这些特性都符合民主政治价值观。在民主的条件下,所有的人都是在根本上平等的,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一个原则——并达到平等的尊严。公开对话是民主的一个核心特点。民主体制致力于用公开的讨论——公开场合的对话——来取代官僚权利以及传统沉淀下来的其他权利。没有信任,也就没有民主。而且,如果民主屈服于威权主义或者暴力,那民主就会被削弱。

当我们将这些原则当作理想应用到人际关系上时,我们是在谈论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称之为情感方面的民主可能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我认

为,情感方面的民主与公众民主对于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这可以应用到父母孩子关系上,不只是适用于其他领域。他们之间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等同。无论从谁的利益出发,父母都必定拥有对孩子的权威。然而,他们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大体上的平等。在一个民主的家庭中,父母的权威应该是建立在一个隐含的默契之上。父母这样对孩子说可能更有效:“如果你们长大了,像我现在知道的这么多了,就会理解我所让你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你们好。”传统家庭里的孩子往往惟命是从,许多为孩子的反叛行为而烦恼的父母可能非常希望能恢复这种权威。但是,事情是不会也不应该走回头路的。在民主的感情关系中,孩子能够而且应该能够顶嘴了。

感情方面的民主并不是意味着没有规矩或者缺乏尊敬,只是通过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当民主开始取代专制的管理和暴力统治时,在公共关系领域就会出现一些类似的情况。

情感方面的民主会不再把异性关系和同性关系作明显的区分。比起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在发现和实践新的社会关系方面领先了一步。同性恋以前不得不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因为如果一旦暴露,同

性恋者得不到传统婚姻关系的正常支持。

加强情感民主并不意味着家庭义务的削弱，也不意味着削弱有关家庭的公共关系。民主就意味着对规则接受，正像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力一样。保护未成年人就应该是立法和道德的基本内容，无论她们的生活条件如何，法律要求父母把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婚姻也不再是一个经济的关系，它变成了一个礼仪方式的认同，有助于对脆弱关系的加强。如果这些观点对于异性关系是适用的话，那么对于同性关系也是同样的。

在这里会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回答，在短短的一章中我们不可能讨论这么多问题。显然，我致力于讨论的是在西方国家影响家庭生活的一些趋势。在传统家庭保留的比较完整的地区，比如我开始时提到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呢？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变化是否会在全球越来越普遍呢？

我相信是这样的，实际上确实如此。问题不是传统家庭的存在形式是否会改变，问题仅仅是何时、以什么方式。甚至我认为不仅如此，我前面描述的正在浮现的情感民主其实正是全球统一主义与前面讲过的传统思想斗争的前沿，性别平等、女性的性自由，所有这些传统家庭所不容的东西都是正统思想

所诅咒的。它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宗教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西方国家或者其他地区，家庭的状态有很多值得担忧的地方，我们不能认为传统家庭的衰落是一场灾难，也不能说每种家庭形式都一样的好。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与政客们及原教旨主义者们的观点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对传统家庭的坚守或者信仰比起传统家庭的衰落来讲更令人担忧。在贫穷的国家，推进民主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什么呢？准确地讲是妇女的平等和文化教育。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改变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家庭。

性平等并不仅仅是民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它还会带来快乐和满足。家庭发生的很多变化都是困难的、充满问题的，但调查发现，几乎没有人愿意回到传统的男女角色，或者合法化的不平等关系上去。每当我试图把传统的家庭当作最完美的家庭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那了不起的阿姨说过的一句话，她或许拥有了一段最长的婚姻，超过60年。但她有一次承认，在整个婚姻期间，跟他在一起一直非常不开心，但在那个时代，她无法逃避。

第五章 民 主

1989年11月9日，我在柏林参加一个会议，那时候还属于西德的西柏林。在会上，有一些人来自东柏林。其中一个人在那天下午离开了会场，但后来又带着激动的表情回来。他是东德人，他说柏林墙马上就要被推倒。

我们中的一些人马上赶到了那里，梯子已经立在了墙上，我们立刻往上爬。但我们又被刚赶到现场的电视台的采访人员赶了下来，他们说必须他们

先上去，才能把我们爬上墙头的景况拍摄下来。他们甚至劝说一些人爬了两次，以便他们能获得最满意的电视效果。

电视台人员没有最先赶到现场，但还是把那一刻壮观的时刻表现了出来。像我下面继续要描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电视采访人员有权利把他们自己推向最前沿。因为电视在柏林墙被推倒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1989年东欧巨变的过程中，电视普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主和自治是1989年巨变的推动力量。我想表达的是，在民主思想的传播中，全球沟通的进展在最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民主或许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前苏联和它的东欧盟国都标称自己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些半封建的王国没有明显地标称民主，比如沙特阿拉伯，但即便是这些国家也不能说与民主一点都不沾边。

什么是民主？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词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在下面我要对它做出解释，民主是一个有效的党派竞选体系。在民主的条件下，选举是定期的、公平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参加。民主参与的

权利是与公民自由相联系的，人们享有表达和讨论的权利，可以组建或者参加团体和组织。

民主不是一个绝对化的概念，可以有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层次的民主。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就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曾经有一位英国的旅游者问它的美国同伴："你怎么能容忍在一个你不想请他共进晚餐的人的手下工作？"那个美国人则回答："你怎么能容忍在一个不想请您共进晚餐的人的手下工作？"

现在每个人都是民主人士了，但并不是原来就这样。民主思想在19世纪遭到了整个精英和统治阶层的猛烈的反对，而且经常遭到嘲笑。民主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追求的理想，但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有限的民主，仅有一小部分人有选举权。即便是一些极力鼓吹民主政府的人，比如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认为应当加以限制。密尔建议，某些人的选票要比另一些人多一些，用他的话来讲，"聪明人和有才能的人"才能够比"愚蠢和没有才能的人"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西方，民主是在20世纪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仅仅在四个国家里妇女拥有选举权：芬兰、挪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瑞士，妇女在1974年才获得选举权。甚至，一些实现

了全面民主的国家后来又遭到了复辟。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和葡萄牙都经历过独裁或者军管的阶段。除欧洲、北美和澳洲以外,仅有极少的国家坚持了民主制度,比如拉美的哥斯达黎加。

在最近几十年,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上民主政府的数量翻了一番还多。有30多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同时所有已经实现了民主的国家也都坚持了下来。这是从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推翻军管统治开始的。在后来民主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南美和中美洲获得了胜利,包括巴西和阿根廷在内的12个国家陆续建立或重新建立了民主制度。

所有的大陆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1989年以后发生了的东欧和前苏联的民主巨变,在后来是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在亚洲,由于反复和其他原因,民主化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现在,比如韩国、菲律宾、孟加拉、泰国和蒙古。而印度从1947年独立开始就一直坚持了民主制度。

当然一些正在走向民主化的国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民主,或者说延迟了民主化过程,比如俄罗斯就

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些国家只是恢复了以前的制度，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以前就曾是民主国家，东欧的捷克和波兰也是这样。由于在这些国家，民主政府经常被推翻，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民主变革会持续多久。但毕竟民主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取得的进步比以前的一个世纪还要大。为什么？

一些人认为是民主和自由经济相结合的西方模式取得了胜利，这是一个可能的答案。其他的体制也努力做到这一点，但是最终没有成功。民主最终获得了胜利是因为它是最好的制度。从一些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对此不想争论，民主确实是最好的。但是对于最近发生的民主浪潮来讲，这个解释是不够的，它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变化发生在历史的这个阶段。

为了获得更好的答案，我们就要弄明白我所说的民主的两面性。这个两面性是指，就像我刚才描述的，民主制度正在全球普及，但是在其他国家都要模仿的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却出现了民主意识的削弱在扩散的现象。最近几年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对政客们的信任程度在下降。像以往那样出来投票的人越来越少，在美国这种现象尤其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说他们对议会和政治

没有兴趣。为什么在民主国家里人们对民主越来越淡漠,而同时民主又在其他国家取得了进展?

我在本书中所分析的那些变化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对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讲,生活不再由命运所决定,不再是事先决定而无法改变的。独裁统治在适应全球经济竞争的灵活性和推动力等方面显得不够协调,基于独裁统治的政治力量再也不能够把世界退回到传统的顺从和崇拜的时代了。

在一个充满沟通的世界里,单纯的从上至下的强权政治不再是有效的了。在强力统治下的苏联等官僚制度下所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体现,它需要更大的分权和灵活性。基于所处政治体系的单向的信息沟通在本质为开放结构的全球沟通中是没有前途的。

在 1989 年的东欧运动中,许多人走向了街头,但是与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革命不同,这次运动几乎没有出现暴力行为。也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会通过和平的方式结束,但事实就是这样。

在 1989 年出现的仅有的一些暴力行为都与抢占电视台有关,占领了电视台的人们就获得了发言的权力。通讯革命创造了比以前更为积极和更具反

思性的公民。同时也正是这些沟通手段的发展导致了民主体制下的不满情绪。在一个打破传统的社会,政客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一些盛大的仪式等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功绩。正统的议会政治制度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并发生彻底的变革浪潮。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应当何去何从呢?我们是否就应该认为在民主似乎只是流于形式的时候,民主制度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呢?

在不同的西方国家关于对政府的信任状况的民意调查中,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确实,人们对于政客和传统的民主程序的信任度大为下降。但是对于民主的作用,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念。最近在美国和主要的西欧国家进行的调查表明,超过90%的人对于民主政府还是支持的。而且,与预想的不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相反,人们比以往更关心政治,其中还包括年轻的一代。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年轻人对社会不满并且采取逃避的态度。

他们愤世嫉俗是因为他们抱怨政客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他们所关心的政治问题政客们却很少提及。很多人认为政府只是一个腐败的经济组织,政治领导人是自私的,并不真心关心选民们的利

益。年轻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环境问题、人权、家庭和性自由。从经济的层面来讲，他们不相信政客们能够应对推动世界的力量。每个人都明白，这些力量超出了国家范畴。思想激进分子把他们的精力都用在特殊的利益群体上也就是不奇怪的了，因为这样才能保证正统的政治所解决不了的事情。

那么民主和积极的政府在看起来失去了他们的价值的时候如何坚持下去呢？我认为是有答案的，民主国家需要的就是依靠民主本身。我把它称为民主化的民主（democratising democracy）。而且现在的民主应当是超越国界的民主。我们应当从上到下地完全把国家民主化。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全球化的响应，这适应于政治，也适用于其他领域。

民主需要深化，因为现在公民与管理者生活在同样的信息环境下，旧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社会不再适用了。当然，西方的民主政府一直比其他专制国家光明正大些，但毕竟也有些偷偷摸摸的情况。比如，想像一下在冷战时期，在美国和英国为了核试验和研制武器有多少人被政府隐藏起来。西方的民主体系也存在关系网、政治赞助、后台等问题。他们也经常会利用传统的形式和传统的权利象征，而这些都不是彻底的民主。英国的上院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之一。当传统不那么严格的时候，原来神圣不可侵犯和令人尊敬的东西一夜之间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变得非常可笑。

在过去几年中全球出现了那么多的政界丑闻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从日本到法国、德国，从美国到英国，政治丑闻成了新闻的主要内容。但我并不认为，那些民主国家现在比以前更加官僚了，只是在一个信息开放的社会，丑闻更容易被发现，而且官僚的衡量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过去在英国，即便是在左翼党派执政时期，关系网是正常的做事方式。这种关系网现在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这些过去经常发生并被广泛接受的方式现在却被认为是非法的。

由于背景的不同，在不同的国家民主的民主化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但没有一个国家已经进步到可以避免这个过程。民主的民主化意味着权力的有效传递方式，比如在英国，权力被极大地集中在国家这一层面。民主化的民主意味着在所有的层次上都有避免官僚的办法。

这还往往意味着体制的改革，在政治事务中透明度要极大地提升。我们甚至还要做好准备试着改变一下民主的程序，尤其是要有助于使政治决定更接近选民的日常想法。比如，人民陪审团制度和电

子方式的投票办法,不会取代代表制的民主制度,但是都是很好的补充。

政党应该比以往更加注重与单一目的团体(single-issue group)的合作,比如一些生态组织。一些人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脆弱的、无序的,然而事实上这些反对派们是对的。人们比以往更积极地参加到各种组织和协会,在英国,参加自发或自助性组织的人比参加党派的人多20倍。在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

单一目的团体关注的往往是最前沿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是正规的政党所不注意而一旦发现又为时已晚的问题。在英国发生疯牛病危机以前,就有一些组织提出过关于食物链污染的警告。

民主化的民主还取决于公民意识的大力培养。这种文化不是市场经济中可以产生的,也不是某些特定的利益组织能够产生的。我们不能把社会想像成二元化的结构——国家与市场,或者公众与个人。在二者之间是包括家庭和其他非经济组织在内的公民社会,建立情感民主就是积极的公民文化的一部分。公民社会是一个宽容等民主态度必须培养的舞台。公众的氛围可以由政府加以强化,但是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基础。

民主化的民主并不仅仅与成熟的民主社会有关,它也有助于在民主不够发达和完善的地方建立民主制度。比如在俄罗斯,到处是强盗式的资本主义,专制的阴影又由来已久,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方式并不能建立一个更开放、更民主的社会,还需要自上而下的公民文化的回复。用市场经济来代替可能原来更稳定的国家经济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完善的民主被恰当地比作三条腿的凳子,政府、经济和公民社会,三者应该达到平衡。如果其中一点高于其他两点,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在前苏联,国家统治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领域,结果,经济没有活力,公民社会则几乎被消灭。

在这个综合体中,我们不能忽略媒体的作用。媒体,尤其是电视,与民主有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我前面也强调过,全球信息社会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民主推进力量;另一方面,电视和其他媒体通过将政治观点的平民化和个性化,几乎摧毁了他们自己所打开的公众对话空间。而且,巨大的跨国媒体公司的发展,意味着无须经过选举的大亨们拥有了巨大的能量。

对抗这种能力并不单纯是国家政策的事情,关键是,民主的民主化并不会停留在国家的层面上。

就像实践中一样，一直以来，民主政治就假设一个国家是能够自治的，而且可以自然地形成与之有关的绝大部分制度。它还假设是一个能够完全独立自治的国家。但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完全独立自治已经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国家或民族国家仍然是强大的，但是就像政治科学家赫尔德所指出的，在国家与日益影响国家公民生活的全球化力量之间，民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缺陷。生态危机、全球的经济波动和全球的科技进步，根本不会考虑国界的存在。它们也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就像前面讲到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民主已经建立得很好的地区，人们对于民主的需求降低了。

在国家的层面之上讨论民主问题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然而，这种思想在 100 年以前就经常被谈到。后来却是两次世界大战代替了全球的融合共处，在 20 世纪战争夺去了超过 1 亿人的生命。

现在情况不同了么？显然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定的答案，但我相信是这样。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就给出了理由。世界比一个世纪以前更加相互依赖，社会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另一面来讲，我们共同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等问题也更大了。

在国家层面之上的民主应该如何构建呢？我希

望借助跨国的和全球性的组织，就像它的名字，联合国就是一个国家联合的组织。至少到现在为止，联合国还没有对独立的国家构成威胁，它的宪章也不允许它这样做。欧盟就不同了，我希望它能够创造一种模式，而且极有可能这种模式会被其他地区所效仿。欧盟的意义不在于地处欧洲，关键是它开创了一种跨国管理的模式。与一些支持或者反对它的人的看法相反，它既不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也不是一个超级国家，但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家联合，参加欧盟的国家被要求放弃一些独立国家的权利。

现在的欧盟本身也不是特别的民主，有关欧盟的一个说法是，如果欧盟自己来申请加入欧盟，就不会被批准，欧盟本身就不符合对成员所要求的民主标准。但是，没有什么原则的事情阻止其更加民主化，而且我们应该为此而施加压力。

从全球的秩序来看，欧盟的存在使人明白了民主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这个跨国体系也有助于促进国家内和国家之间的民主。比如欧洲法庭，已经做出了很多在成员国实施的决定，其中包括一些保护个人权力的措施。

我们在20世纪末看一下整个世界，我们有同样多的乐观和悲观的理由。民主的扩散就符合这种情

况，从表面来看，民主就像一朵脆弱的花，一方面它的领地在逐渐扩大，另一方面世界上到处都在蔑视人权。在科索沃，成千上万的人被赶离家乡，所有的法规被置于不顾。这里我想从一篇观察报告中引用几句话，“在马其顿地区，有接近50万难民”，他写道，“没有人知道他们以什么为生。来马其顿帮帮我们吧！”这篇报道发表在1922年10月20日的《多伦多每日之星》(Toronto Daily Star)，作者是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如果有人认为有些事情是无法解决的，那是可以理解的。民主只有在特定的土壤里才能繁荣起来，而且需要长期的培育。在没有长时间的民主政府经历的国家和地区，民主的根基显得很浅，很容易被推翻。但或许这种情况正在变化，与其我们把民主当作一朵脆弱的很容易被蹂躏的花，还不如当作一株坚韧的小草，在最贫瘠的土地上都能够生长。如果我的观点正确的话，民主的繁荣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化。没有什么东西不经历斗争，在任何层次上的民主都是值得为之奋斗的，而且最终都会达到。我们失控的世界不是不需要政府的管理，而是需要更多，当然，只有更民主化的体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附录一：

处于舞台中心的中左翼

托尼·布莱尔所说的中左翼有明确的立场吗？在大选之前提出这个问题带有某种紧迫性，特别是因为谨慎是选举战略的主导思想。随着托利党继续向右倾斜，托利党可能攻击的领域由于进一步成为中心地带的一部分而中性化了。难道中左翼所做的全部都是对保守主义政策的逐项盗用吗？

在竞选过程中，马丁·亚克和斯图尔特·霍尔写

了一篇令人气愤的文章："托尼·布莱尔：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后的最大托利党分子?"。在文章中，他们写道："虽然托利党人发生了分化、衰退以及混乱，但是他们的主张、哲学以及优先的行动正在界定着新工党想到和提到的方案。"

由于新工党已经转向了中心，所以工党只不过是回过锅的撒切尔主义的残羹剩饭。他们说："布莱尔政府将一团糟，而且是短命的。"

布莱尔必须和其他参与到这件事的人一样保持清醒。他已经精心地把党内成功的全面改革与党外实施的"不要动摇改革大船"的哲学结合在一起了。工党的宣言指出："我们已经实现了工党的现代化，而且将实现英国的现代化。"但是前者没有给后者提供太多的引导。而且在工党中很容易用上"现代化"这个词。当把这个词用在作为整体的工业国家时，更需要弄清楚这个词的意思。

实现这个任务的代价是高昂的。在战后，这个国家先后两次率先提出了影响全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观念与政策。第一次是建立了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工党为它的形成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二次是撒切尔主义，或者更广义地讲是新自由主义。如果新工党有未来的蓝图和行动的勇气，它就能够

成为新政治框架的引爆点,这个框架与以前的相比,更重要,更有影响。因为旧的"福利共识"不再有效,所以布莱尔正确地指出,不能回到以前那个状态。然而,新自由主义不仅早已失去了活力,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缺陷重重、自我矛盾的政治哲学,托利党人已经目睹了它带来的损失,工党如果不能超越它也会遭受损失。

工党已经开始了英国政治的第三阶段吗?或者它还陷于亚克和霍尔断言的难以理清头绪的泥潭吗?

我的看法是,工党以及集合在它周围的顾问和知识分子已经在使命完成上有了很好的开端,即使到目前为止行动的结果还不特别令人兴奋、引人注目。中心左翼的事业已经建立起来了,并在稳步前进。新工党努力从劳动力市场、产业以及政府组织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投资于人力和社会资本,国家必须在投资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弥补传统投资方式的不足。要通过利权人文化(不论人们怎样看待它)鼓励公司确立长远观。宪政改革,不论在哪个方面都是人们期望的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将在社会资本发展中发挥作用,因为社会资本能提高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要通过强调传统家庭、道德教

育以及某种程度上新义务对权利的替代,在道德上为整项事业打下基础。

在所有改革中都蕴藏着某种力量,它确实努力切断同新自由主义的联系。从人们对这项事业的描绘中透露出把英国从美国的模式中拉出来,沿着利权人资本主义或莱茵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的努力。我不怀疑投资于人力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而且利权人观念肯定富有价值,尽管这些主张本身不像它们的倡导者们说得那样完美。但是执政的新工党需要详细考虑一下全部这些主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迎接挑战。

下面,我将不揣浅陋就中左翼的事业如何深入提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将提出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提供可能的答案,它们中的大部分仅供参考,因为中左翼完善有力的纲领还正在形成之中。

1) 什么是中左翼?

按照我的理解,它是针对世界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采取的政治立场,这里的变化指的是左/右的区分

不再像从前那样对现实有分析作用。出现新的政治忠诚和新的共识形成方式成为了可能,它们中的许多问题没有清晰的左或右的答案。中心左翼不排斥激进主义,实际上它试图发展起激进中心的观念。只要有人相信左和右仍然能够界定所有有价值的观念和政治中的政策,激进中心这个词就犯了修辞矛盾的错误。我认为这个词指的是存在着需要用激进方式解决的政治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上也能够把跨阶级的支持聚集起来。

中左翼继续从左翼价值那里汲取灵感,但是承认社会主义作为经济管理理论和历史解释理论死亡了。留存下来的左右差别体现在,左翼分子在价值上更强调推动平等和民主,而且相信国家仍然能够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事情。

2) 中左翼面对的变化是什么?

全球化是影响我们生活的主导性现象,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贫乏。全球化这个词尽管在10年前几乎没人使用过,但是现在变得人所共知了,这造成

了一种反应，某些人认为全球化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神话。这种出发点是相当错误的。然而，我们不仅应该把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竞争的激烈化，而且更应该把它理解为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学习适应全球世界主义的社会，以及它的益处和变化。这个社会正在产生着地震似的冲击，破坏着从婚姻、家庭到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我们熟悉的各种制度。与许多专家的看法相反，全球化使政治决策比以前更紧迫，更有影响，而不是更无所谓。

激进的思维和政策是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利用好全球化带来的机会的必要因素。工党议程上的首要政策问题包括宪政改革、放权、福利国家改革以及欧盟的未来，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

3）什么应该是现代化事业？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目前世界上有两种形式的现代化，在某些方面它们相互冲突。

我所说的"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指的是沿着直线推动社会财富增加的现代化过程，像过去发生的那

样，在这个过程中繁荣、安全以及生活整体质量的改善会同步进行。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第二阶段的现代化"就发生了，在这个阶段中，现代化还意味着对现代化的局限性、紧张和困难的缓解。

不能用第一阶段的方法解决第二阶段出现的问题。例如，到目前为止，亚洲经济的发展一直是线性的，是第一阶段的现代化。现在，更成熟的亚洲经济遇到了第二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的现代化不意味着经济的停滞状态或不增长。它的一贯目标是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增长率，逐步地实现繁荣。但是它还意味着既要解决生活中过量的问题（如交通），也要解决证明对经济发展有害的事情。它要求对备受关注的生态问题给予考虑。工党的宣言比以前的政策更强调环保主义，但是在这方面有很长的路要走。生态的观念有助于把社会经济复兴计划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结合在一起。商业和生态团体正在不断加强合作，而不是认为彼此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税收制度能够进一步按照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的要求改革；从生态角度考虑的城市和交通政策要与其他领域的各种政策结合在一起。

4)新工党没有完整的经济政策。如果一种理论既不能是凯恩斯主义的,也不应该是新自由主义的,那它会是什么样的?

还没有人有清晰的答案,但是一个正在出现的范式对于工党经济方向的形成可能会有价值。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Mandel)所说的高风险经济范式。

高风险经济反映了全球化了的环境,在这种经济中,像我们早已看到的那样,财富创造、安全和生活质量变得密不可分。对不确定性的积极承认以及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中作出成功"投资"决定的能力正逐渐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成功基础。像曼德尔说的那样,增长是由"增强而不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力量推动的"。在高风险经济中,寻找确定的事情从长期来看不是有效的战略。存在着太多可利用的信息,进出随便,而且竞争者云集。政府必须利用符合人民正当要求的安全手段帮助他们。我们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努力把人民与风险隔离开来。接受风险是繁荣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迎接繁荣带来的生态和其他问题的必要条件)。安全是由保险提供的。由

于福利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控制的管理风险的制度，因而对安全的考虑与重建福利有着直接的关系。

现在存在着许多可能性。例如，收入的平均分配(averaging)。收入的平均分配意味着在3～4年的平均收入基础上计算税收的交纳义务，而不是每年都重新计算。这种方法对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有利，或者对收入大幅度减少的人(不是收入大幅度增加的人)有利，而且不会减弱激励机制。

如果这种财富创造模式是合理的，它就包含了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前提。例如，在不阻抑金融市场的发展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的大部分部门正在模仿着金融市场。

5)在某些方面，失业是当前最基本的社会挑战，新工党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工党的方法是把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与充分就业这一传统目标结合在一起。反对不平等和贫困也是工党的基本方法。

工党的宣言提出，“消除贫困的最好方法是帮助

人们找到工作——真正的工作。"这似乎是工党的最强项，但是我同意批评者的意见，这方面是工党的弱项。像美国的例子显示的那样，让人们找到工作不一定解决了贫困问题，而且充分就业在含义上不可能像前一代人理解的那样。工党必须把关于工作未来的争论当作一件要紧的事对付，而且应该通过与工会合作来解决这件事。除了 18 岁以下和 65 岁以上的人口外，英国只有 1/3 的劳动力有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这是老式的"充分就业"的基础。同时，待业(*non-employment*)(与失业相对)的含义越来越广。

这种现象与不平等问题的联系比想像的更密切。现有的福利制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各个方面都需要重新调整，同时不采取通过收入税把富人的收入向穷人进一步转移的方法。相反，我们应该寻找就业再分配的措施，以及更普遍地工作再分配的措施。政府在各个领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这点。工党目前采取的某些减少长期失业的政策有助于工作的再分配，但是这些政策对于问题的解决只是杯水车薪。工作的再分配可能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措施：给那些在人员录用和工作稳定方面做出贡献，符合更广泛的社会需要的公司提供税收激励；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范围，除了发挥教育的文明建设

(civilising)作用外,还要延长入学的年龄限制,并且使之有利于劳动力就业;对一定范围的老年人实行临时退休和重新工作计划;打破"适合男人的"工作与"适合女人的"工作之间的界限;鼓励男人根据家庭的责任更全面地定位自己,而且要采取措施,使带孩子的妇女更容易保持一份工作。

工党提出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不会阻止底层阶级(underclass)的形成。然而如果中左翼的"左"有某种意义的话,这就是工党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与新自由主义明确区分开来。如何区分呢? 有许多思路。事实表明,不平等不利于全球市场上的经济成功。总体而言,不平等程度高的社会似乎比程度低的社会更不繁荣(而且经济更不健康)。为什么不把消除贫困的协调行动融合到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战略中去呢? 当然,我们面对的根本问题是:我们能否为无法更有力地制约有钱人(The Haves)特权的穷人做些事呢?

6)工党的道德姿态应该是什么呢?

它现在的道德姿态令人担心。基督教、强大的家庭以及严厉打击犯罪,所有这些使工党的许多支持者很不舒服。特别是在这个方面,新工党似乎不但已经成了托利党,而且甚至更接近托利党的右翼了。

工党的战略家会说严肃地谈论道德问题是他们的特点。当布莱尔开始成为领袖时,他用工党不再对犯罪手软来说服公众。现在流行谈论强大家庭和教育人们分清对错的区别。现在为什么放弃这些事呢?

与其放弃这些事,不如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并且摆脱它们的威权主义色彩。托利党在同时主张经济个人主义和道德威权主义的时候,试图颠倒黑白。布莱尔不应该坚持这种分类错误。为什么要在所有其他的情况下用谈论现代化来挽救这个错误呢?对中左翼来说,惟一合理的事业实际上是世界主义的,即承认文化多元是全球化的秩序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不能存在一种由某个集团强加的道德；道德问题必须进行公开讨论，而且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持久的法律框架，包括国际法。主张回归传统经典，或者回归传统家庭并不合理。准确地讲，必须确立个人主义与社会义务之间的新平衡，但是现有政策无法做到这点。

迎合小英格兰人（Little England）的成见可能对于打败保守党是必要的，保守党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民粹主义的平台。一位称职的领导必须在某个方面接受这些成见，而不是摆脱它们。影响婚姻、家庭、性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和发生在其他制度中的变化一样深刻。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出现了这些变化，而且一个有效的政策平台必须建立起来，以便积极地回应这些变化。

7)最后，工党应该对欧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只能做一个简短的结论。作为一位政治领袖，布莱尔有巨大的机会在欧洲留下痕迹，这应该成为他未来几年关注的主要问题。老一代欧洲领导人

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而布莱尔是未来一代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最成功的政治家。然而，要使人们体验到这些，布莱尔需要做的不是仅仅停留在填满托利党留下的“空位子”。欧盟应该被理解为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和对全球化的反应。

从这个角度讲，包括苏格兰自治在内的权力下放和英国宪政改革可以被看作一种更广义的模式的组成部分。全球化推动了权力向上和向外的转移，但同时带来了向下下放权力的压力。地方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地方自治的更普遍要求是这些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过程创造着超国界的制度和组织。在这个意义上“附属”首先不是欧盟的“政策”，而是其真正存在的结构性条件。

托尼·布莱尔现在在两个意义上把握着领导欧洲的机会。他能保证欧洲人心中所想的真正实现，同时能够领导欧洲找到一个有影响的新纲领。虽然执政的新工党有可能陷入琐事的争吵以及希望的幻灭之中，但是中心左翼能够确立雄心勃勃的政治立场。如果真正做到这点，历史将呼唤着进一步的行动。

（安东尼·吉登斯著，杨雪冬译自《新政治家》，1997年5月专号）

附录二：

左派瘫痪之后

一年前，恰好是大选之前，我为这家杂志写了一篇替新工党辩护的文章，反击左派的两位批评者马丁·亚克魁斯和斯图尔特·豪尔的非难。他们的批评在主旨上类似，即新工党给人们提供的不过是撒切尔主义的残羹冷饭。执政一年后，许多人的那种工党正在以另一种名义执行新自由主义日程的感觉仍然没有消失。党内外持不同意见者不断附和着亚克

魁斯和豪尔的观点。

更恼人的是，这种批评在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圈内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看法。1998 年 2 月当托尼·布莱尔结束与比尔·克林顿的华盛顿政策会谈回来的时候，他谈到了自己要为 21 世纪创建一种国际中左共识的雄心，这就是不同于老左派和新右派的“第三条道路”。克林顿早在对国会的讲演中就提出已经找到了一条第三条道路。

某些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对布莱尔的宣言反应冷淡。他们认为，由于欧洲有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传统，所以克林顿的政策非常不符合欧洲的情况。而且，谈论“第三条道路”勾起了人们对过去不愉快的回忆。这个词在二三十年代被一些臭命昭著的运动使用过，与“左”和“右”这样的词一样是几乎过时的概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条道路”逐渐成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没有前途的观点的代名词。

然而，不论我们是否使用第三条道路这个标签——由于没有更好的名词姑且在这里使用这个称呼——欧洲和美国的政治思维正在发生着某些极为重要的转变。布莱尔号召在国际上对这些转变进行论辩非常正确。不但在必须找到某种不同于老左派和新右派的东西方面，而且在左派(Leftist)政治理论正

在从1989年后的瘫痪状态恢复过来方面，人们的认识不断达成一致。虽然在这些方面许多论者似乎期盼着一种能澄清新政治的大理论的出现，但是我认为这样做犯了一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发展一种框架，它能够与其他两个理论竞争对手清清楚楚地区别开来。我们知道第三条道路不是这样一种框架，但是借助这样的比较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找到可供选择的路线。虽然可以全面地进行比较，但由于篇幅有限，我只比较五个方面，它们是政治价值、经济、政府、国家(Nation)和福利国家。而且这里做的比较是提纲挈领式的。

1. 社会民主是清晰的左派阶级政治，其主要的选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新自由主义虽然很少公开声称自己是一种阶级政治，但是它是一种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上的保守哲学。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以及东西方两极对立格局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与右的传统分界也模糊了。由于极右政党的存在，左与右还没有完全失去它们的重要性。然而，今天的主要问题跨越了左右界限，或者重塑着这种界限，这些问题包括对全球化的回应、文化的多样性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在许多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左右划分作为

理解当代社会和政治态度的一种手段并不全面。例如,约翰·布朗代尔和布赖恩·高斯查克在以对英国进行的调查为基础完成的《超越左右》报告中提出政治态度分为五类而不是两类。在托尼·布莱尔的领导下进行改造的工党在 1997 年大选前夕,获得了这五个群体中的四个的支持。

由于得到了如此广泛的选民的支持,第三条道路代表着中心正在进行着的新现代化运动。它在接受了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了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它为自己树立了反对威权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目标。另一方面,第三条道路不是极端自由主义。个人自由依靠集体资源,并且意味着社会正义。像新自由主义者说的那样,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相反,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完善的必要因素。

2. 在经济问题上给人的第一印象好像只有"一条道路",而且批评者在这方面似乎论据确凿。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不论把自己看作左派还是右派,各国政府都忙于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并且把其他资产贱卖给私有部门。同时,市场在全球范围处于无与匹敌的地位。

难道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这样横扫世界了吗?事

实清楚地表明,它没有做到而且也不能做到。新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犯的共同的大错误是把解除管制等同于自由。与极端自由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在道德领域中没有犯这种错误——为什么经济领域中的事应该与道德领域中的事有所不同呢?这两个领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经济管制常常是自由与繁荣的条件。而且,解除某个经济领域中的管制常常会轻易地把管制的需要转移到其他领域中,例如像环境领域这样的另一类问题,或者把管制的范围从当地推向区域,甚至全球范围。

这里的问题是我所说的创造一种新的混合经济。与旧的混合经济不同的是,新的混合经济主要不是指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达成平衡的关系。它指的是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

管制尽管不总是,但通常是国家或政府的职权,因为只有政府拥有法律惩罚机制。需要管制的理由多种多样,其中有些很类似,有些彼此非常矛盾,但是总的数量惊人。其中有以下几个:

- 当垄断威胁到经济竞争时维护竞争。像经济学家J·斯蒂格利茨强调的那样,对于经济繁荣来说,竞争比是否对某个部门私有化更重要。被管制的竞

争通常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基础。

- 控制自然垄断。某些产业只有采取垄断才能有效地运行。两条独立系统的铁路或者独立运转的电力网是浪费性重复建设。在这种情况下，管制就像反托拉斯措施一样必要。
- 创造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所有的市场依赖丰富的非经济资本的积累。与新自由主义的说教相反，市场不会自然地产生秩序，或者避开暴力，土匪式或强盗式的资本主义证明了这点。
- 使公共品、政治或文化品避免市场的恶意侵扰。职业信念、利他性服务、社群情感和道德义务以及其他非经济性的东西都需要保护，以避开市场交易的干扰破坏。
- 利用市场实现中长期目标。虽然说市场总是短视不准确，但是毫无疑问市场常常优先考虑短期收益而不是长期利益。清理饮用水、道路安全、无污染食品都可以说明市场能够禁止为生产而追逐成本削减的行为。
- 在微观或宏观层次上平抑市场波动。例如，在一种随意“炒鱿鱼”的企业文化中，社会更广义的善被忽视了。
- 保障工人的物质条件和劳动合同。因为工人不是

一种“和其他东西一样的商品”,任何公平的社会都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 对天灾(包括市场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及时反应并解决。出于预防会瞬间发生的天灾、潜在的生态疾病的需要,对市场实行前瞻性管制是必要的。

在新的混合经济中,对经济发展的评估和调整要一直根据发展的更广泛后果进行。这个主张也包括商业企业在内。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如果存在着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原则的话,这些原则必须适用于商业企业。负责的企业就是承认并按照这些原则行动,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的企业。政府能够创造一种利权人(Stakeholding)的企业文化吗?当然它能够做到这点,通过综合使用激励和控制手段,只不过这些工作必须在跨国层面以及国家层面上同时进行罢了。

3. 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热衷于扩大国家和政府的干预范围,而新自由主义者要求缩小国家。第三条道路认为,必须超越“政府是个问题”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观念,重建国家和政府。自由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这不是因为它受到了对手的威胁,相反它没有了竞争对手。有危险但无敌手的国家必须找到不同于过去的合法化源泉。

因为民主的程度不够,自由民主正在衰落。民主制度正在反对着民主制度,而且必须解决这种失衡的关系。为了重新获得信任与合法性,第三条道路主张进行全面的一揽子改革,这些改革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界定新的民主国家。

新民主国家建立的基础首先是下解权力,不仅向下而且也向上: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附属(subsidiarity)不应该视为只是为欧盟辩护,它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结构性条件。政府的行动范围不再以国家边界为限。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世界治理必须提上日程,这也意味着民主权威的双向运动。

对于新民主国家来说,关键是"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在公共事务中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实验非正统的民主参与形式,如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和与市民社会各种组织积极的合作态度相伴随。社会民主党人有怀疑市民社会的传统。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所有政府都必须从市民社会中撤出,让市民社会组织发育繁荣。

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在市民社会重建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理念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必要组成因素。与老左派相比,第三条道路承认对市民精神的衰落

和犯罪率上升的忧虑反映了真实而紧迫的问题。然而,通过恢复共同体的战略,政府能够以直接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对某些批评家来说强调共同体似乎有悖全球化的影响。实际上,前者与后者相契合,因为全球化不仅拿走了本土的东西,而且还给本土添加了东西,为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前进的新动力和新机会。

4. 一般来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始终对民族国家(Nation)没多大兴趣,他们用怀疑的态度看待它,并且把它视为国际团结的威胁。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倾向于把一种自信的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与他们对自由市场的鼓吹混在一起。第三条道路试图为民族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找到一个新位置。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作为"纯粹的市场"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重要的是重新肯定民族作为稳定力量的地位,它是对付无休止分裂的平衡力量。当然,民族主义的自身特点不会消失。但是准确地说那是一种更世界化的民族身份前景,需要我们加以调整制约。这样一种世界主义是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可能消失的原因和条件。"强国"在过去,意味着备战精良的国家,今天则肯定指的是对接受主权的新限定有充分信心的国家。

在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之前,国家有边界无国界,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在自己的外围边缘地带实现权威。目前国家的国界正在再次成为边界,因为国家与其他地区的跨国界联系加强了,而且各种跨国团体涉足了国内事务。欧盟是一个典型,但是国界的软化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正在出现。

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是积极的国家。但是现在的国家构建与以前相比有不同的意义。在过去,国家的统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对其他民族的仇视推动的。以英国为例,像林达·考来指出的那样,国家构建的动力是对天主教法国的敌意。今天民族认同需要以更开放更多样的方式维持,不仅要考虑到民族认同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要考虑到与民族认同交织在一起的其他类型的忠诚。这意味着民族认同要进行更反省性的建构,这是一项现代化的工程。冷漠的英国人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好名声,但是他们正在走向正轨。

5. 没有哪个问题会比福利国家更能泾渭分明地把社会民主党人和新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了。对前者来说,一套发展完善的福利体制是一个公正体面而且人道的社会的基石;而对后者来说,福利制

度则是企业的敌人,市民秩序衰败的原因。一个团体想要维持最大化的福利国家,而另一个团体想要把福利制度减小到安全网的程度。

第三条道路提供的看法与这两种看法迥异。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是合理的。福利机关常常是异化的、官僚主义的。福利收益创造了既得利益,而且还会有负面后果,破坏了最初建立福利时确立的目标。福利国家需要进行激进的改革,目的不仅是缩小它,而且要使它对我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作出反应。在勾画现代福利国家(他憎恶这个词)的蓝图时,贝弗里奇提出了著名的向匮乏、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散宣战。换句话说,他关注的问题大部分是消极的。我们应该把强调的重点转到积极的福利上,除了国家以外,个人自己和其他组织都对它负责,而且它会推动财富的创造。

改革了的福利国家将是一种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在风险和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保险原则、对风险的预防仍然会是社会投资国家的核心。但是我们也需要利用风险的更积极或更有活力的一面,因为这是通向富有动力、创新社会之路。社会投资国家的主要原则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

要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直接给予利益。

当然,改革现实世界中的福利国家是一件棘手而且困难的事,所有的政党都明白这点。有些与这项改革有关的根本性问题我这里根本就没有涉及,它们包括:怎样对付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怎样提供普遍的健康照顾,如何改革家庭政策,完全就业现在应该意味什么以及我们是否正在更深地陷于"工作社会"(Work society)还是远离了它。然而,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新政治与其他两个政治都在解决原则上和实际政策上有清楚的界限。

在以后的时间中,应该积极地实现建立一个中—左国际的思想,把不同立场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团结在一起。

为什么英国不应该像托尼·布莱尔提议的那样成为催化剂呢?工党不会是欧洲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特洛依木马,它能够成为美国左派和欧洲左派对话开始的引爆火花,这会塑造广泛的政治改革。

(安东尼·吉登斯著,杨雪冬译自《新政治家》1998年5月1日号)

附录三：

丰裕、贫困和后匮乏社会思想

本文讨论的起点是一个已经令我们惊讶的世界。这里的“我们”不仅指知识分子和实际政策的制定者，还包括普通个人。至少在西方，我们都是启蒙思想某个流派的继承者。启蒙运动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其中有各种不同的思想，优秀的启蒙哲学家的著作往往深邃而敏锐。然而总的来说，他们反对传统、偏见以及蒙昧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兴起会揭示出事物的本质。

理解本身一直被认为是一件没有结尾而且难达全面的事。同时,知识的扩展就是对无知,对所有现在以及将来都无法知道的事情的认识。尽管如此,在启蒙时代,知识就被假定为累积性的,并且可以带来对周围世界的逐渐掌握。我们越能够理解自己、自己的历史以及自然领域,我们就越有能力掌握它们,为我所用。这条基本定理被充分表达,似乎极为合理。知识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人类支配领域的不断扩大。

马克思把这个观点纳入了其对历史根本动力的解释之中,进行了最清晰的表述。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类只能探究到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对历史的理解是我们塑造未来命运的根本途径。在未来的状态上,即使那些没有马克思乐观的思想家也接受了这个定理,认为人类可以逐渐控制我们的生活环境。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就是一例。韦伯肯定不认为历史能带来马克思预言的人类解放。在他看来,未来可能是“无法控制的官僚统治”——我们都注定生活在理性的“铁笼”中,受官僚组织和机械技术的双重影响。我们都将成为一部庞大而且不停运转的人类理性力量系统中的微小环节。

但韦伯的预想也已经无法令我们信服。这幅更昏暗的图画不符合我们在20世纪末看到的真实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日益被人类控制，相反，似乎在摆脱控制——用艾德蒙·里奇(Edmund Leach，1968)的话说，这是一个"逃逸的世界"。而且，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生存感觉说成是缺乏累积性知识的结果。相反，这种飘忽不定的特点正好与知识的积累有密切关系。我们现在面对的不确定性并不像启蒙思想家认为的那样，源于无知。实际上，我们对历史以及周围物质世界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不确定性。

与前辈的世界相比，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实际上可能更有确定感。但无论如何，很难理解这个结论的有效性。这正是已经变化了的不确定性的根源。我们生活的社会和物质世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为不确定性"。人为不确定性或者说人为风险源自人类改变历史进程以及自然形态的企图。我们可以把人为风险与"外部风险"区分开来。外部风险是源于不被人类掌握的自然或"不被掌握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表现为自然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的不确定性。

对全球变暖的争论——这是一个关于"不再是

自然的自然”的争论——就是人为不确定性到来的一个例证。尽管对于其可能的结果的所有预测都是无法想像的，但是大多数科学专家相信全球变暖正在发生。然而，有些科学家相信整个全球变暖的观点是一个神话，有少部分人认为事实相反，正在发生的是漫长的全球变凉过程。围绕全球变暖假设出现的不确定性不是来自“不受掌握的自然”，而恰恰来自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来自“自然的终结”。既然我们不能充分肯定全球变暖是否正在发生，那么可能最好在政策层面上采取“虚拟”态度。如果全球变暖的某些后果成为灾难，国家以及更大规模的世界共同体采取预警措施才是合理的。

人为的不确定性决不仅限于“不再是自然的自然”。它也侵入了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从地方，甚至个人的行为情景直到那些影响全球制度的情况。例如，西方社会中的个人结婚决定。50年前，决定结婚的人知道自己的行为意义：结婚是一种相对固定的劳动分工，双方有具体的位置。现在除了知道它是一种“关系”外，谁也不再清楚它的实际含义。因为深刻的变革影响到性别关系、家庭、性态(Sexuality)以及情感。

人为风险逐渐超过外部风险的原因何在呢？显

然，这种转变的原因与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带来有密切关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系列非常根本的变革席卷了世界，加速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产生条件的转变。有三组变革正在对所有工业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大多数社会。

第一组变革是全球化的影响。虽然全球化这个词最近几乎无处不在，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我在这里是这样理解的：全球化不单单指世界经济竞争的激烈化。此外它还意味着其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一组复杂过程。如果有人想从技术角度确定近几年来全球化的进展，那么首先是全球卫星通信系统。由于它的建立，全球任何地方间的即时沟通成为可能。全球即时沟通的产生不仅改变了地方经验的本质，而且有利于建立新的制度。例如，全天货币市场只有在卫星通信系统建立后才有可能出现。而它已经影响着几乎所有人的生活。

全球化不只是一个"外在"(out there)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全球体系的产生，而且指日常生活每一个环节的变革。因此它是一个"内在"(*in here*)的现象，甚至影响着个人认同的亲密行为(intimacies)。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人们对曼德拉形象的

熟悉甚至超过了对邻居的熟悉，这是一个与以前相当不同的社会行为情景。全球化侵入了行为的本土情景，但并没有摧毁它们；相反，出现了新形式的本土文化自主性，呼吁本土文化认同和自我表现。这实际上与全球化进程有密切联系。

最近几年中社会变革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解传统化。在这里我们还能够把变革的长期过程与过去几十年发生的更加剧烈的变化区别开来。当然，现代性总是置身于传统的对立面——这是启蒙运动的根本源头之一。然而，在乌利希·贝克所说的“简单现代化”这个漫长过程中，现代性和传统是以一种共生的状态存在的（参见 Beck et al, 1994）。科学本身成为一种传统——一个人们寻求解决困惑或问题时诉求的既定权威。现代性和传统的这种共生是“简单现代化”阶段的标志——大致上说，这个阶段指的是工业化和现代性的第一个 150 年。

在“反思的现代化”阶段（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加速了），传统的地位被改变了。解传统化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终结。相反，在许多环境下传统被重新注入了活力并得到积极维护。这是原教旨主义的根源，而后者的历史并不长。原教旨主义可以被定义为用传统方式维护传统，然而现在的背景是一个不

断需要理由的全球化世界。传统的“理由”不同于话语的理由。当然,可以用话语为传统辩护,但是传统的根本内涵是,它具有真理的“表现意义”、真理的仪式意义。真理通过传统惯例和象征体现出来。因此,今天我们毫不惊讶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传统与更开放的生活方式选择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和龃龉。

解传统化与“自然的终结”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二者实际上经常交织在一起。在周围的物质世界——以及身体——的每个部分几乎都受到了人类干预影响的意义上,“自然”消失。传统和自然在过去一直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表现了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随着传统和自然的消解,在某些以前无法“决定”的领域中,必须(有人)作出一系列新的决定。

以人类再生产领域为例。再生产的许多方面在以前是“给定的”——不受人类决定的影响,但是现在基本上或者说实际上是可塑造的。根本不用和任何一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就可能生小孩;孩子的性别可以选择;避孕效果非常好,因此生孩子根本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然而,在再生产领域中,“自然的终结”与解传统化造成的社会变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今天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降低的核心

是提高妇女自主性的诸多变化以及相应的传统两性关系的改变。

席卷世界的第三组变革与社会反思性的扩展有关。这也不局限在西方或者发达社会,而是与交往的全球化有密切联系。“反思性”不等于自觉(self-consciousness)。准确地说,指的是在解传统的社会秩序中生活的状态。在这样的秩序下,每一个人肯定面临,并且应付多种信息和知识,其中包括零乱的、矛盾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必须对自我的生活进行反思,这是一种生活的手段。以上面提到的结婚决定为例。这个决定是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作出的。这些信息涉及“性关系”、“婚姻承诺”、性态本质的变化、性别关系以及婚姻本身这种制度。这些信息或知识不单单是作出结婚决定的“背景”。像前面说的那样,它们成为其所描绘的行动环境的组成部分。

在一个需要高度反思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产生了许多新的奖赏和日益增强的自主形式,同时也带来了新问题和紧张感。用饮食失调和厌食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西方国家中,饮食失调是一个相对新的普遍现象,只有30多年的历史。它们是所有人都“节食”的社会的病态。对“节食者”来说,他们

随时都可以获得各种食品。饮食不再是“自然”给定的——由当地的季节和当地的产品供应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个人必须根据自己想要什么身材决定吃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选择一种饮食方法。饮食从本质上与身体的培育有了密切联系。对于某些人,特别是青年妇女来说,与外形有关的社会压力是以病态的和强迫的形式出现。

当我们决定吃什么以及如何吃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对现在和以后的健康作着决定。一个人可以坚定地遵守传统饮食,继续吸烟以及保持各种习惯。而广泛普及的医疗知识表明这些习惯对人体是有害的。然而他(她)在懂得这些知识后也可以继续保持这些习惯。视而不见实际上是一种决定。

在一个充满社会变动的全球化世界中,以前的制度开始遇到压力。从个人的以及亲密的社会联系到大规模的全球秩序,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面临着压力。例如,在政治领域,投票人与他们的政治领袖现在处于同样的话语区中。因此政治合法性开始受到冲击。忠诚可能瓦解,以前的政治活动和程序开始遇到广泛质疑。在世界许多国家,腐败成了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尽管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重视,但以前就有腐败。今天,社会透明度进入了新阶

段，政治生活中曾经被接受的行为变成非法的了(尽管有时反过来说也是真的)。

撇开这个政治事例，我要把重点集中在福利国家和福利制度问题上。大部分社会政策学者认为西方福利国家现在处于危机中。人们一般是从财政角度理解这场危机的——把它看作中产阶级“不能交纳，不愿交纳”心态的产物。换句话说，在社会更富裕的部门，人们日益拒绝那种可以支持其他不富裕者的税收水平。有时，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可以被描绘为一种“自满的文化”(加尔布雷斯语)：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已经取得了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并且要保护它。其他人更把这种情况看作一种紧张感和不安全感。中产阶级也不可避免地为自己担忧，而这以前主要是社会更低层者的忧虑。

这不是说福利国家财政危机这个论点完全错误。它并不错。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思考福利国家遇到的问题。可以说，福利国家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风险管理危机。福利国家是作为“安全国家”出现的，而且实际上在有些国家就有这种称呼。相对于私人保险，它是社会化的、公共的保险。现代性与保险的结合是一件有趣而且富有启迪的事情。从总体来说，现代文明面向的是未来而不

是过去,要把"未来殖民化"——未来不过是要"占领"的一块"领土"。因此,早期工业企业与保险概念的出现联系密切并不令人吃惊。什么是保险呢?它是组织未来时间的一种手段。保险是保护不同环境下的个人和团体在未来免遭灾难的手段。

福利国家是在应对外部风险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保险体系。个人总会遇到某些事情:他(她)会生病或残疾,离婚或失业。福利国家会保护这些遇到问题的人。但是在人为不确定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建立在外部风险基础上的福利制度开始瓦解。离婚情况的变化就可以说明这点。在半个世纪前,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只有少数人会离婚。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是男人离开女人,因为法律和经济条件使妇女很难摆脱婚姻。在只有少数人离婚的情况下,离婚可以被看作"自然的灾难"——如果你非常不幸就会遇到。当时的离婚是在性别和家庭关系非常明确固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西方国家,不仅离婚率远远超过了以前,而且很多婚姻的破裂首先是由妇女提出的。在这种情况下,想一想个人和经济生活中的其他诸多变化,再把离婚看作"自然的灾难"变得毫无意义。离婚(以及再婚)成了更积极地应对生活问题的方式。福利制度无法按原来的方式介入,

必须重新调整和组织,以便作出负责的决定。

健康和疾病也同样如此。福利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的:生病是在特定情况下的偶然。在一个生活方式更积极的世界中,身体同样也不是"给定的",因此这个假设不能成立。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会受到生活方式决定以及周围环境状态改变的强烈影响。保健制度遇到压力不仅因为标准的医疗成本不断增加,而且因为医疗依然还过多地停留在疾病是外部风险的假设上。

最近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大部分来自新自由主义右派。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制度助长了依赖,并没有鼓励更负责的生活方式。新自由主义一直想削减福利开支,并一有可能就试图把福利制度转变为市场。虽然新自由主义者的方式有些拐弯抹角和消极,但是比大部分福利国家的维护者更好地理解了福利国家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缺陷。但是他们对市场的痴迷削弱了批评的意义。我们不应该采取新自由主义式的攻击,要努力提供一种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批评意见。对福利国家的积极批评目的在于:重建福利制度,使之适应这个解传统的、人为不确定性的事情之中。虽然这里不是讨论的地方,但是按照这种思路可以提出许多有趣而且重要的问题。

积极福利就是要积极作出生活决定而不是消极地计算风险。我们应该从积极福利的角度思考。这不仅应用于思考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而且在考虑全球贫富国家之间表面上难以克服的差距时也要如此。今天，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是，应对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这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所谓的"解放政治"指的是左翼自由政治理论和实践以前占据的政治领域。解放政治关心的是摆脱压迫的自由，社会正义以及消除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它也一直是保守主义的明确特征。保守主义正是对起源于美国和法国革命中高扬的左翼自由价值的回应。

解放政治是生活机会的政治。随着生活政治的到来，解放政治的问题的重要性没有削弱。相反，生活政治的问题逐渐成为了政治决定的新条件。生活政治不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一种生活决定的政治。随着传统和自然的终结，它也逐渐浮现出来。在许多解传统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必须作出新的决定。这些决定几乎总是政治性的，并具有伦理或价值尺度。然而，关键的是，生活政治问题不能按照解放政治的标准解决。

堕胎的争论就是生活政治问题的一个例子。在

堕胎可以轻易进行并毫无危险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问题。然而，堕胎争论中的问题并不完全是解放政治的问题。妇女运动要求堕胎权是一个解放的问题，但这种方式不能完全解决堕胎产生的问题。后者的核心是“胎儿在哪个时刻成为人了?”

用来说明正在出现的生活政治议程的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家庭的争论。在大部分国家，家庭突然政治化了，而且“家庭价值”的讨论也激烈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家庭生活的解传统化，而这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发生的事情。虽然关于家庭的讨论肯定会继续提出解放的问题，但是绝不限于此。许多问题是与生活决定的伦理有关的。家庭不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正在重新构建。

生活政治问题越接近政治议程中心，就越有理由思考“后匮乏社会”的兴起。虽然“后匮乏社会”在工业化国家中特别突出，但是在全世界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后匮乏社会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在这里把我的用法与其他人的用法区分开来很重要。在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就有“后匮乏”这个词的一种含义，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在这个意义上，“后匮乏”指的是丰富的普遍化。马克

思至少暗示了工业社会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有可能满足每个人的所有可能需要。匮乏最终会消失。这不是我说的意思。有些物品，特别是地位一直是短缺的。而且就世界本身来说，似乎不可能创造出一个极度丰富的社会秩序。

最近，后匮乏思想经常与所谓的“英格尔哈特论题”联系在一起。在调查的基础上，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 1977)提出工业化国家中正在兴起一股“后物质主义”潮流。人们不再把经济增长当作惟一的追求目标，生活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就其有效性来说，英格尔哈特论题肯定与我使用的后匮乏社会的含义有关，但并没有揭示出这个词的全部特征。

我所说的后匮乏社会不是一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形态，而是一系列正在出现的趋势。这些趋势包括：

- 生活政治问题在政治争论中日益突出。
- 出现了波及到所有人的人为风险。有些生态风险(但不是全部)就是这种类型的，尽管生态灾难只是一种一般的风险形式。
- “生产主义”的衰落。这个词指的是对经济增长的笃信。生产主义把付酬工作作为社会生活的核心特征。后匮乏社会的这个特征与英格尔哈特的观

点最为吻合。

●人们日益认识到现代性问题不一定能通过更高的现代性解决。实际上这指的是人们更普遍地意识到人为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在技术和技术创新领域中可以发现许多例子。不能只从技术角度来衡量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价值。例如,技术信息无法就是否应建立核电站作出结论。这种决定必然涉及政治因素。

向后匮乏社会形态发展的趋势确实出现了,它们有可能改变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等诸问题上的博弈条件。对于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来说也有一些积极意义。理解这些表明,某些生活政治的问题对于解决政治解放中的更艰巨问题非常重要。

现有减缓不平等的方法是把财富或收入直接从更富裕的群体转移到贫困群体。我不是主张应该放弃这种直接转移的方法。然而,它们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与前面所说的福利国家的困难有密切联系。政治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与政治左翼对国际福利援助项目的批评之间有某些有趣的相似。就福利国家来说,右派作者已经主张(例如)建造大规模住房产生了更多的问题。这些房屋破坏了过去的共

同体生活方式,并且滋生了福利依赖。虽然左翼在讨论福利制度的时候反对这种分析,但是在谈到全球援助项目的缺点的时候,观点却相当相似。例如,对于修建大型水坝的援助,批评者就认为会破坏当地的相互依存形式,并在新的资源供应方式上依赖官僚。

从横向考虑减轻不平等至少在原则上有可能走出这种困境。我们先不要考虑直接转移财富或收入,应该思考"生活方式博弈"(life-style bargaining)的可能性。生活方式博弈要依据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联盟对资源进行配置。我们可以区分五种类型的生活方式博弈。尽管我要强调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但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博弈在某些条件下都可能向下重新再分配资源。

生活方式博弈的第一种形式依靠的是积极的风险管理。在许多情况下(无论是发达国家内部还是之外),积极管理人为风险都能产生资源的有效再分配。保健领域就是一个例子。一般来说,贫困(相对的和绝对的)与染上各种疾病的风险之间有相当直接的联系。实际的贫困状况并不总会产生这种联系,应该说产生这种联系的是穷人的某种生活方式习惯。健康教育、饮食以及身体的自我保健等计划

就是向下的再分配。从这些计划中获益最多的人可能来自贫困群体，尽管一般来说他们得到的重要信息或健康手段没有更富有的个人多。

第二种博弈是经济生活方式博弈。在这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有直接的经济交换关系。经济生活博弈的一个主要领域是付酬工作的分配和本质。工作领域中有强大的不平等增强趋势。例如，有人认为，由于全球竞争的冲击，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的工人的工资在普遍下降——公司从劳动成本下降中获得了利益。而且，新技术也会在不产生新的工作需求的同时减少工作岗位。

然而，并不是所有影响付酬工作的变化都对平等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且我们有可能看到相反的趋势和积极的政策。在未来的20年中工作数量可能急剧减少，因此工作分配是整个社会整合的关键。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关于工作的博弈可能是向下的再分配。高收入的人（特别是男人）有提前退休的趋势。当然，有些不是自愿的，而且这些人留下的岗位可能会有人填补——至少有具有相同水平的人。然而，许多提前退休的人是精心选择的。他们是"时间先锋"，因为他们认为灵活地控制自己的职业比严格地按部就班工作更重要。当离开这些岗位的时

候，他们解放了自己也给年轻一代留下了位置——这会产生“连锁效应”。因此，被再分配的工作会以固定的方式“向下渗透”，但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改变不大。然而如果为一个年轻人创造一份工作，即使这份工作报酬相对很低，那么结果可能是资源的向下再分配，因为年轻人在“新穷人”和失业群体中的分布不均匀。

第三种生活方式博弈是生态上的。与其他类别相似，我们知道生态目标经常与为实现资源向下分配的努力发生冲突。在生态上敏感的政策有时很昂贵，而且可能与权势集团的经济利益相悖。例如，限制工业污染的管制会减少解决贫困人口就业的工业生产方式。然而，无论如何，生态方面的消息不都是坏的——在许多情况下生态的生活方式博弈能够实现向下的再分配。这不仅适用于发达社会也适用于全球范围。因为贫困人口经常由于环境的限制才被迫采取破坏生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例子既包括发达国家的汽油污染也包括贫困的第三世界砍伐雨林。

就像生活方式博弈的其他领域一样，在许多情景下更富裕的群体可以从减少生态破坏行为中获得利益。举一个小例子。最近一些欧洲政府采取了这

样的政策:如果车主的汽车污染特别严重,但愿意购买更环保的新车,那么政府可以向他们支付一定的补贴。由于老汽车是废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而其主人基本上是穷人,所以这种政策能够产生向下的再分配。

在物质不平等上,生活方式博弈的第四种形式可能在表面上没有其他三种重要。我把它称作情感生活方式的博弈。然而,它不是最不重要的类型,在某些方面它对其他类型来说非常关键。它指的是对我们生活的情感条件的博弈,而且作为对前面描述的广泛的社会变革的回应,这些条件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更正式的情景一样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两性关系的变化,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绝对不限于经济发达的社会。

现在,全世界的妇女都获得了以前被拒绝或者无法获得的自主形式。就实现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政治权利来说,这种权利显然具有强大的解放要素。然而,自主权同时也深深地侵入到生活政治领域,因为它提出了在解传统的社会和文化中,究竟如何定义妇女以及男人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没有什么比男女之间订立新的社会契约的可能性更重要,因为两性分工影响到所有社会的其他诸多分层

形式。

就达成的程度来说，两性之间的新社会契约肯定是向下的再分配。因为所有妇女基本上都在权利上逊于男人，而且占“新穷人”的大部分。对性别和性态的重新界定不仅直接影响到家庭领域而且影响到工作领域。改善妇女工作条件的大部分创新或变革都反映出其他的不平等——反之亦然。那么对男人有什么影响呢？假定男人会重新定义自己生活的情感和沟通平衡，不再把付酬工作以及公共领域其他活动放在生活的首位，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普遍。那么这样的环境会产生许多的后果，推动更大的经济平等，而且这些后果会在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中得到发展。

在大范围不平等，社分化甚至分裂的趋势日益强大的情况下，这种对积极的生活方式博弈的讨论似乎是空想。应该强调的是，我现在不认为生活方式博弈的向下再分配效应有任何必然性。然而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在人为不确定性和解传统化下这种博弈可能成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政治动员的核心特征。在发达社会中未来可能出现许多新的契约，其中的一些会直接在选举政治中突出出来。例如，其中的一个可能产生于老人与年轻人之间，因为他们

在当代世界都是受剥夺最严重的群体。与以往一样,影响社会生活的潮流不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总有可能进行个人和集体的选择——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生活政治的核心。我们可以努力使任何选择取得成果。生活政治机制为我们提供了保护某些解放价值的可能,否则它们可能失去自己的支点。

本文原载《发展与变革》(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96年第27卷,安东尼·吉登斯著,杨雪冬译。

参考文献:

Beck, Ulrich,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ach, Edmund (1968) *A Runaway World*? London: BBC Publications.

附录四：

吉登斯其人其书

如果罗列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最有知名度的西方社会学者的话，吉登斯恐怕要名列其中。其声望的建立一方面得益于一些中国学者的鼎力介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他所建构的雄心勃勃的社会理论，不仅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中占据了重要一席，影响着社会学以外的诸多学科，而且其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英国工党接受，成了

后者恢复失去了近20年的执政地位的指导理论。这样,一个学术界中的活跃分子转瞬间变成了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明星,被更多的人,特别是西方世界之外的人所认识。其倡导的"超越左与右"的思想成了西方主流社会中最流行的术语,"第三条道路"成了政治家吸引选民的最煽情口号。

在某种程度上,吉登斯的最大贡献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发展,而是其社会政治理论为世纪末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理论,而且为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和选择。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西方的学术主流一直以校园为基地,或者醉心于纯粹思辩,或者潜心于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分析,始终与主流政治保持着距离。在二战之后,倡导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主张价值中立,不问政治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成为这两种倾向的突出代表,并且主导着整个西方学界。60年代步入学界的吉登斯并没有拘泥于这种状况,反而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从理论高度来寻求走出这种二元对立困境的出路。可以说,在目前西方主要社会理论家,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家中,吉登斯是与主流政治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他不仅以一个社会

学家特有的视角密切关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而且在批判的同时,积极地提供更现实的解决路径。这也许是当代西方学术发展中一个最引人关注而且发人深思的情况。

一、吉登斯其人其书

安东尼·吉登斯 1938 年生于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大学教育是从赫尔大学开始的。他先想主攻英语,被拒绝后又试图学哲学,由于感觉索然无味,遂改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没想到这反而成了他沉浸身心的职业。1959 年毕业后吉登斯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硕士,论文题目是《现代英国的体育和社会》,研究了体育,特别是足球与现代英国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这段学习经历使他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 30 多年后,1997 年,他重新回到这里,以院长的身份主持这所名校的工作,罗揽人才,把它变成了英国工党重要的思想库。同时,吉登斯还是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这家现在在西方社会科学界非常活跃的出版社的创办者。

1961年毕业后，吉登斯先后在莱斯特大学、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山矶分校任教。1969年受聘于英伦名校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此后长期在此任教。这是吉登斯学术生涯的重大转折。因为剑桥大学在英伦学界的主导地位及其世界性影响，为吉登斯迅速在西方学术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吉登斯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开始着手制定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其中主要包括：1)对欧洲思想传统的梳理和批判性重组；2)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各种变量的辨识与分析；3)人类学的研究项目。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吉登斯没有拘泥于狭义的社会学研究，而是扩大了自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他积极关注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力图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进自己正在建构的理论体系中，丰富传统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和层次性。同时，他不断提升自己理论的深度，从一个社会学者向社会理论家转变。在这一点上，他与哈贝马斯走的学术路径非常相似，虽然双方最初所受的学术训练不同(吉登斯的学术训练似乎更有实证性；哈贝马斯似乎思辨性更强)。他们都是从梳理西方学术传统，尤其是欧洲思想传

统入手,然后在解读传统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分析概念,建构自己的分析框架。接着用这种框架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生活,并且逐步涉足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最终使自己的理论成为被这些领域承认并利用的一种广义社会理论。

按照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可以把吉登斯的学术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吉登斯从分析和梳理欧洲传统思想,特别是三大古典社会理论家,即马克思、韦伯以及杜克海姆的著作入手,开始逐步创造自己的分析概念和分析框架。1971年,他出版了分析马克思、韦伯和杜克海姆著作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标志着他正式步入社会理论的王国并在梳理欧洲思想传统上取得初步成就。这本书被认为是了解社会学的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出版后几乎每年都被重印。此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1972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思想中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和1978年出版的《杜克海姆》。1976年,《社会学方法新规则》出版,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正式提出。1979年,他发表了《社会理论的中心难题》,继续阐述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其中第一次把时空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心概念。1981年,《当代历史

唯物主义批判》一书出版，在书的第一章，他完整地勾画出结构化理论。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吉登斯逐步地运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社会历史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生活。1981年的《权力、财产与国家》与1985年的《民族国家与暴力》是最初的尝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84年，吉登斯的《社会的构成》一书出版，副标题是“结构化理论大纲”。该书被认为是吉登斯迄今对自己的结构化理论的较为详尽的阐述。在20世纪90年代，吉登斯把关注的目光转到了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中，《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私人关系的转变》(1992)、《失控的世界》(1999)等书更深入地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变迁。而《超越左与右》和《第三条道路》等书则代表了吉登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

吉登斯是一个非常多产的学者，除了上述一些著作外，他还有几本论文集，并且主编了许多论文集。分别在1989年和1990年出版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原著选读》是英美两国社会学系学生使用的教材。

二、"二元"困境与结构化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重大的变革。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使生产结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国家角色、国家间关系等整体性宏观社会结构和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也动摇了启蒙时代以来确立的整套社会认知标准、价值取向以及信仰体系,西方社会陷入一片困惑。1968年席卷西方主要国家的学生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新社会运动正是这种社会整体困惑的极端体现。而在社会科学界,则一改二战后形成的那种拘泥于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框架中的认知方式,多种理论交相出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的和面临的问题。其中一度最引人注意的是两大思想流派。一方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另一方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前者主张全面改造西方晚期资本主义,但是同时对于西方社会的前途流露出强烈的悲观主义,认为技术的进步或者带来人的全面异化,或者为新

极权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后者则固守价值中立,对西方社会问题采取逐渐改造的态度,认为技术的发展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保持乐观的同时,忽视了对社会的批判。

这种两极化的态度和认识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二元化”困境。这种困境的源头不仅有古希腊、罗马文化,还有基督教精神。只是在启蒙时代后,这种困境似乎更为显著,并且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自然、科学-宗教、国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等关系成了人们认识和实践最便利的框架。我们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具有一种“便利性”,对于人们认识这个纷繁的世界是方便的工具。同时由于这种便利,也容易简单化。从长远和深层来看,实际上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更大的困惑,使整个社会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之中。而整个社会科学界也没有逃脱这个困境,为了理论上的逻辑性,夸大个别因素的解释能力,造成方法论之间的排斥性,混淆现实与理念、历史与现实、解释与工具之间的关系。最终的结果是,或者为了批判牺牲了建设性,走向虚无主义;或者为了建设舍弃了批判力,用事务主义阉割了理想主义。

以研究当代西方社会为己任的吉登斯试图在方法论和价值取向上摆脱这种“二元”困境。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代表了其在方法论上的尝试。我们知道，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吉登斯通过对西方经典理论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从马克思、韦伯、杜克海姆一直到二战后许多社会理论家，多徘徊在“二元论”中，常常把其中的一元推向极至，从中探求分析社会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他们或者强调社会结构作为整体对个人及其行动的决定性制约作用，而把工人淹没在社会结构之中，或者相反，认为个人才是社会的惟一的构成要素，他们的行为、理性、动机、信仰等等，是解释社会构成及其变迁的原发因子。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试图克服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的二元对立而提出的，它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①

吉登斯说，自己的结构化理论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确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具有实质的重要

① 黄平，“吉登斯”，载于苏国勋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6页。

性，因此社会科学必须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有能力的、可理解的人类能动者。二是避免陷入主观主义，而且要把握和理解比我们存在更久的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组成。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反功能主义和反进化论的。我们知道，二战后功能主义长期主导着社会学理论。不论是“规范功能主义”（帕森斯），还是“冲突功能主义”（默顿），还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更隐蔽的功能主义都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认为社会或者社会系统都有“需求”；二是通过分析它们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既有的社会过程会体现为现有的状态。吉登斯认为功能主义在这里有三个谬误：1. 错误地区分了动态和静态、历时性与共时性；2. 由于强调系统需求（needs），无法把人看作有理性的能动者，而后者了解自己社会所为的许多情况；3. 系统没有需求，因此通过分析系统需求根本不能解释任何问题。对于进化论的批判，集中在它把人类发展机械地分为固定的几个阶段或者形态，并且使之普世化。吉登斯借助大量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材料，认为这种认识并没有把所有社会的发展路径都考虑进去，实际上带有偏狭的欧洲中心主义。其长期存在的最大危害是排斥了多样性的存在，扼杀了选择的可能性和创新的可能性。

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和根本性假设。它是为了超越“行动”理论和“制度”理论的对立而提出的。“我认为，所谓的结构的二重性指的是社会体系同时既是社会行动的中介，也是行动结果的结构化特征。……我相信，结构的二重性概念是任何关于社会再生产解释的基础，而且根本没有功能主义色彩。”① 吉登斯特地区别了结构与系统（system）这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社会系统由行动者或行动集体间的关系模式组成，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再生产。因此，社会系统是由“情景化的实践”（situated practices）组成的。而结构可以被分为规则和资源，只有在不断参与到社会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情况下，结构才能够在时空中出现。结构只有一种“具体的”存在。根据这种区分，吉登斯进一步指出，结构的二重性指的是社会实践实质的反复性本质。这个概念“把社会互动的生产（随时随地出现，是有理解力的社会行动者的相机性结构）与社会系统跨越时空的

① Anthony Giddens, 199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e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p19.

再生产联系在一起。”[1]在结构化理论中，有两个基本命题特别值得注意。这两个命题的存在为结构化理论赋予了活力和更大的解释范围，而且直接反映了吉登斯在看待当代西方社会及其前途时所持的相对乐观的态度。它们是：1)对主体(有限)理解力(bounded knowlegeability)的强调；2)时间－空间的坐标系统。

吉登斯认为现有的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忽略了主体及其行动对于社会实践的结构化过程的持续卷入，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连行动者自己都不知道的，但决定他们行为的社会根源上。实际上忽略了主体的能动性以及他们对社会系统以及结构形成与变化的影响；而阐释学和现象学则试图把社会仅仅理解为人类主体任意所为的产物的泥潭，夸大了主体的作用，取消了客观的标准与规律，陷人了唯意志论的怪圈。吉登斯认为，人作为有理解力的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是了解的，而且知之甚多。但是他们的理解力是建立在实践意识的基础上的。他们虽然无法系统地把这种意识表达出来，但不等于无意识，这是他

① Anthony Giddens, 199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e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p27.

们在丰富多样的社会中长期实践的结果。实践获得的知识存量不仅是交往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据,也为他们的行动的目的、理由以及动机提供了解释。必须看到,吉登斯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普通人,而且不仅仅是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他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指出,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原始"社会中的人了解许多所谓高级"文明"的情况,而且积极的抵制被纳入其中。而在日常生活中,被认为外行的普通人则有大量关于社会以及制度的知识。他们的理解力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多样性以及传统继续存在的理由。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理解力在社会整体上表现为反思性。反思性的提高不仅动摇了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知识的确定性以及相应形成的制度、观念,而且为更多的选择,尤其是传统的留存提供了条件。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吉登斯对主体理解力的分析实际上反驳了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现代/传统的二分法定式,强调了社会的连续性以及主体的能动性。这为他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积极评价保守主义并且提倡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埋下了伏笔。时空关系是吉登斯使自己的理论立体化和开放化的重要根据。从某种程度上说,时空关系是他分析描绘所有社会的基本参照系,也是他

把自己抽象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社会的桥梁。吉登斯认为,绝大多数社会理论都没有严肃地考虑社会运动的时空特性,或者仅仅把时间与空间简单地视为主体行动的外部环境;或者把二者分割开来,只重视其中的一方。吉登斯承认自己在海德格尔以及现代地理学家(特别是哈格斯特拉德(Hagerstrand))的著作中受益颇多,因此主张“必须把时空关系放在社会理论的核心”。[1]

他提出所有社会活动都是在时间、空间、结构中进行的,社会秩序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系统如何把时间与空间“捆绑”在一起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在考察社会系统、社会互动、社会转变的时候必须把它们定位在时空关系中。吉登斯在这里提出多对概念,如“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历史时间/世界时刻(history time/world time)、日常生活周期/有机体生命周期/制度的长周期等,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不详细介绍了。但是其中有三个概念特别值得注意,它们反映了吉登斯看待社会发展的基本视角。它们是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时

---

① Anthony Giddens, 199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e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p3.

空交界(time-space edges)以及跨社会系统(inter-societal systems)。时空伸延指的是基于社会互动与系统互动机制上的社会系统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扩展程度。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时空伸延程度的不同。全球化是时空伸延最突出的表现。时空交界指的是不同社会结构类型间的接触形态——而且经常是相互依存。吉登斯用这个概念来强调在社会转变的时候，不同类型社会的共存。跨社会系统是针对单一性社会以及孤立的社会提出的，不仅强调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强调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必须强调的是，后两个概念的应用范围是当代社会。通过这些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吉登斯眼中的当代社会是一个不断扩展，相互联系愈加密切、多样的社会。这种相互联系和多样性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光明的前途。

三、制度视角下的现代性与乌托邦现实主义

现代性是吉登斯社会政治理论关注的主要对象。在他的理论体系中，现代性实际上是当代社会

的代名词。他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的"导论"中写到:"在20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社会学与现代制度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的前提之重新建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①] 由此可见现代性在吉登斯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中心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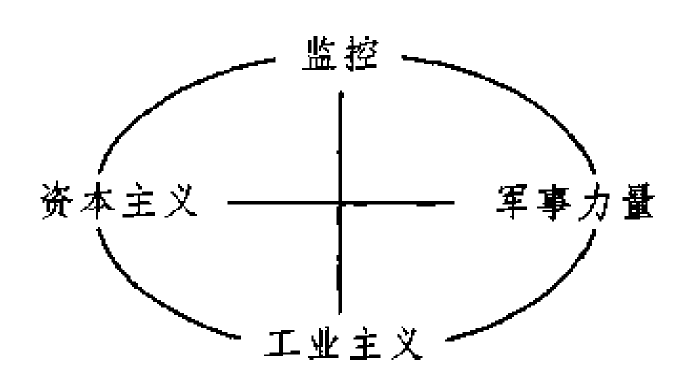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重视不仅源于他的研究旨趣,而且因为他对现有的研究不满。虽然现代性实际上是启蒙时代以来所有理论家关注的对象(显性的或隐性的,不论是否使用这个名词),但并没有给出全面的解释。它们后者用单一因素或者转变机制来分析现代性的起因以及本质,没有揭示现代性的多维制度特征。无论是现代的马克思、杜克海姆还是当代的福柯都难逃这个缺陷;或者从抽象的价值出发,对现代性大加批评,抛弃启蒙,走向相对主义、非理性,乃至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这方面突出

①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的代表。吉登斯认为应该从多维制度角度来研究现代性。在他看来,强调制度是为了避免使理论陷于过于务虚的泥泽以及“主义”的范式,同时提高了批判理论的建设性;强调多维是为了弥补前人研究的片面,寻求现代性发展的多种动力,更深刻地分析现代性造成的全方位影响。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且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①] 它既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资本主义,也不等于现代化理论家眼中的工业主义。它包括四种维度(见图一):1)工业主义,指的是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2)资本主义,指的是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3)监控系统,指的是对信息的控制以及对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监控制度;4)军事力量,指的是在现代战争本身的高度工业化技术化条件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

①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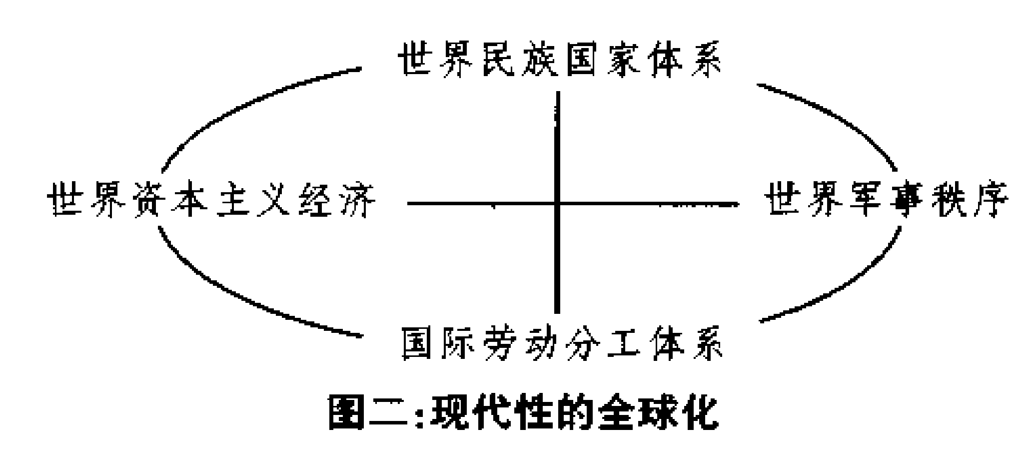
图一：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1990，*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p59.

借助自己建立的时空关系，吉登斯把现代性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虽然从时间的发源以及制度的起点来说，现代性是西方的东西。但是现代性所体现出的制度并不是西方社会特有的。这些制度的全球化倾向使它们扩展到西方以外的社会，并且成为世界性的制度现象。他说："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就是真正的世界性联系的发展过程，这些联系包含在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中或国际的劳动分工之中。"[①] 全球化的

①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出版社，1998 年版第 23 页。

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伸延的基本表现。现代性的全球化为世界性联系提供了制度基础。图二可以说明这种制度基础的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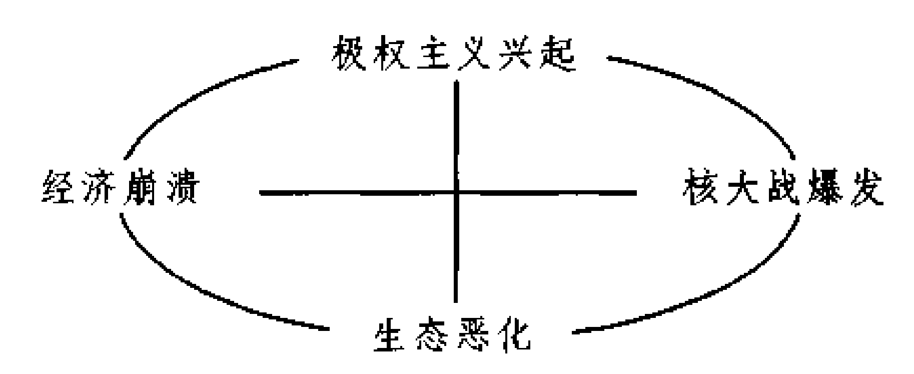


图二:现代性的全球化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71.

现代性的全球化也是一个不断创造新风险的过程,不断改变人们的既有生活方式、认知体系的过程。这些新风险影响的范围更大,带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直接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存在。吉登斯说:"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

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1]如果从四种制度维度来看,这些后果严重的风险包括:极权主义的兴起;全球经济的崩溃;核大战的爆发以及生态的恶化(见图三)。



图三:现代性条件下的后果严重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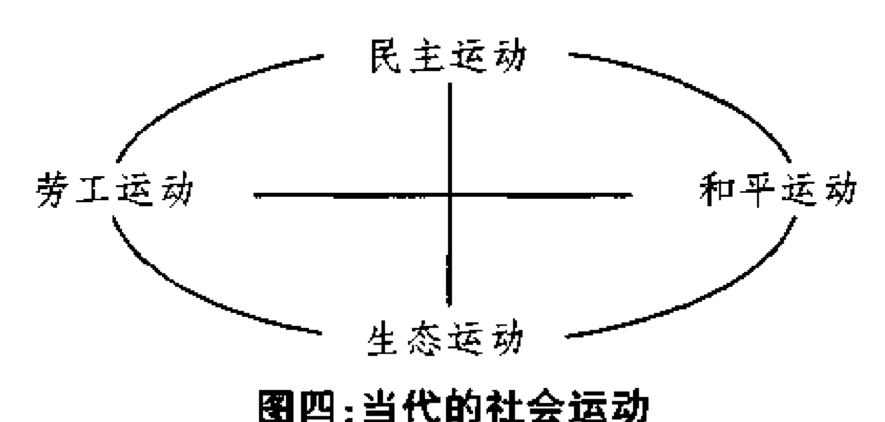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71.

同时人们也不是被动的,也在不断地提高反思能力和理解能力,积极地做着回应。西方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就是对全球性风险的回应。根据自己的制度四维结构,吉登斯很自然地提出了四种社会运动:劳工运动、民主运动、和平运动以及生态运动(见图四)。显然这四种运动针

---

①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然认同》,1998年版第4页。

对的对象是不同的。而且，吉登斯似乎对后两种运动寄予了厚望。他认为，“在濡染着历史性的多元政治体系之中，社会运动至为重要。多数现代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社会运动的影响，有的与既定的组织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决裂，有的则通过进步的政治改革达到了殊途同归的目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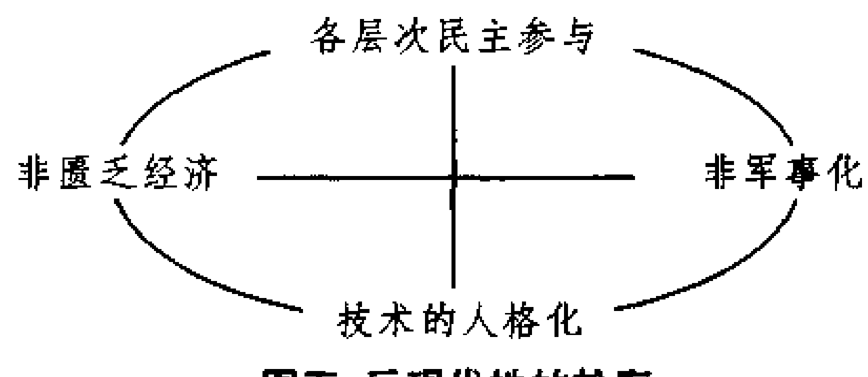
图四：当代的社会运动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59.

吉登斯对于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没有导致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那种悲观前景。一般来说，他很少使用“后现代”一词，通常用“晚期现代性”或“繁

①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三联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4 页。

盛现代性"(high modernity)来指代。他对于晚期现代性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这种乐观主要建立在对现代性制度的积极一面的继续发展,主体、社会乃至全球反思性的提高上。比如,他反对米歇尔斯等人提出的"寡头铁律",认为"监控的密集化,是现代社会及整个世界体系中组织发展的基础,也是迈向民主参与的趋势和压力得以实现的条件。"[1] 我们从他勾画的后现代性的轮廓可以看到这种乐观的态度(图五)。



图五:后现代性的轮廓

资料来源:Anthony Giddens,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64.

由于从制度维度不仅看到了人类面临的问题,

① 《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65页。

也发现了替代性选择,所以吉登斯认为应该放弃"天命论"(providentialism),承认我们现在面前的风险,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诊断和分析制度发展的目前趋势。同时也不能只忙于眼前的问题,流于实用主义。要在内心中保持乌托邦式的理想以及对道德的追求,这样才能清楚地勾画出美好社会的轮廓。在他看来,"一种重新焕发生命力的批判理论要把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同等看待并且结合在一起。"[①]

四、《超越左与右》与"晚期现代性批判理论"三部曲

《超越左与右》一书全面阐述了吉登斯改造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系列理论构想,它与后来出版的《第三条道路》可以并称为英国工党以及许多欧洲社会民主党改革自己的姊妹纲领。本书 1994 年出版,后来

---

① 这是他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第二版所写的前言中的一句话。Anthony Giddens, 199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e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分别在1996年、1998年再版，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超越左与右》是吉登斯计划写作的“晚期现代性批判理论”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前两部分别是1981年出版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1995年第二版)；1985年出版的《民族国家与暴力》。这三部曲实际上是吉登斯借助自己建构的结构化理论逐步拓展自己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的过程。这种分析基本上沿着两个逻辑进行的。一个逻辑是分析意义上的，从抽象理论到实际问题；另一个逻辑是历史意义上的，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的目的是关注“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世界之间的关联”，更全面地分析塑造现代性的多种力量。①

《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一书作为这两个逻辑的起点，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阐述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的结构化理论；二是通过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与前面各阶段的联系。他说：“在本书中，我的目的是关注与资本主义兴起有关的

① 《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页。

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世界历史以前各阶段的联系。"[1]这本书可以被看作是吉登斯对欧洲三大古典社会理论传统分析的最后结束。

他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分析依然是我们研究18世纪以来席卷世界的大规模变革的必要核心。但是，马克思的许多分析是模糊的、不一致的，乃至错误的。而且马克思在许多方面代表了19世纪的认识水平，从现在来看，有很多缺陷。因此，吉登斯的目的就是从当代角度，借助当代各学科的最新发现来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以提供一个认识历史的更全面的视窗。由于篇幅所限，我在这里不能详细分析吉登斯的这种看法。我只想强调两点：一是吉登斯在解读马克思时，带有和许多西方学者同样的缺点，从服务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肢解马克思，简单化其理论。通观全书可以发现，吉登斯明显是从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出发的，目的是进一步论证自己的理论的合理性和全面性，因此这里的马克思是吉登斯版的马克思。二是吉登斯在书中提到了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区分文本的马克思

---

① Anthony Giddens, 1995,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e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与被后人体系化的马克思，马克思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方法。吉登斯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采取的是批判态度，方法则是分析当代社会的发展，借鉴各学科的最新成果。虽然他在分析中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这种批判的态度和开放的视野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也许有一定的启发。

如果说《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更侧重的是理论建构的话，那么《民族国家与暴力》的主要目的则是理论的应用。在书中吉登斯利用自己的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国家这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和制度形式的发展，特别是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和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二战以来，国家这个概念逐渐淡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个人、团体、社会等成了各学科分析的基本单位。在社会学中，学者们讨论的是家庭、阶级和越轨等问题。极少讨论军事制度、军事暴力以及战争对现代社会的冲击。而经典理论在国家问题上的认识也有失偏颇。无论是以杜克海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社会学，还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理论都缺乏对有领土边界的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它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的系统阐述。在吉登斯看来，这可以追溯到圣西门的政治理论遗产

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暗含着圣西门的如下学说:社会进化的结果必然是人对人的管理让位于人对物的管理。而在杜克海姆的思想中则体现了圣西门另一个思想:工业化秩序中的国家在同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中将起到道德方面的作用。至于韦伯,虽然其国家概念中强调了暴力,但是这个概念一方面没有区分开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另一方面把暴力和战争视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要件,把暴力绝对化了。

当代的理论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或者专注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或者专注于国家乃"内部"压力的中心。自由主义者或者没有把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放在首要位置,或者设法绕开军事力量与工业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许多关于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献则陷于这样的困境:"它们倾向于囊括人类历史的各时期;它们倾向于认为,战争始终存在,而且或符合于人类固有的某些攻击性倾向,或对应于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无法规避的利益冲突。"[1]

出于对现有研究的不满意,吉登斯提出了自己

① 《民族国家与暴力》,第33页。

的国家概念。“国家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政治组织：它的统治在地域上是有章可循的，而且还能动员暴力工具来维护这种统治。”[1] 实际上，在吉登斯的概念中，行政管理能力（监控能力）和使用暴力的能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把民族国家看作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中“监控”与“军事力量”的集中体现。

国家从传统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再向民族国家的变迁既是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过程，也是使用暴力能力的增强过程。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出现、发展以及结构性调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双方的契约关系逐渐稳定下来，任何人都必须通过雇佣，获得工资才能够生活，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样，在劳动过程中，暴力性制裁手段逐渐被“排除”了，取代它的是政治监控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国家内部监控能力的增强，使得社会内部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尤其是阶级矛盾）的必要性减弱了。吉登斯说：“工业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出一种新型的阶级体制，在这种阶级体制下，阶级斗争无所不在，而占

① 《民族国家与暴力》，第 21 页。

有或控制着大量资产的统治阶级却并没有或不需要直接靠暴力工具来维护自己的统治。”[①] 这种国内和解是暴力工具逐渐被国家垄断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虽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越高,它的行政体系就越统一,军事生产就越不能主宰其他部门,直接的军事统治就越难维持长久”[②],但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现代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军队的职业化,民族国家垄断的军事力量反而越来越有更广的威胁性。“实际上,在军事力量方面并不存在第三世界。除了核武器扩散有所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在这个意义上都是‘第一世界’,也就是说,它们都拥有能够发动工业化战争的物质手段和组织手段。”[③]

吉登斯在民族国家问题上的这个基本认识虽然有模糊西方社会中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之嫌,但是确实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国家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他对民族国家与暴力之间关系的辩证看法既为其日后在“第三条道路”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建设“利权人文化”(stake-holder),巩固社会团结提

① 《民族国家与暴力》,第197页。

② 同上,第300页。

③ 同上,第342页。

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其在国际问题上主张实现全球治理提出了理论基础。

五、超越还是折衷

《超越左与右》是吉登斯对前面多部著作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的总结，带有强烈的社会改造方案的色彩。全书的立意非常明确：当代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反思的现代化阶段，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解传统化的进行以及个人自我反思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崭新的、潜在破坏力更大的人为不确定性。政治光谱中的左、右两大阵营都无法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以及有效的对策，因此必须超越左右的认识局限，综合众多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出发点，以此来制定能够解决当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方案。吉登斯的构想可谓雄心勃勃，但是这种超越有实现的可能吗？

(一)当代社会变革与人为不确定性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为不确定性的世界，其中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的风险完全不

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三是其中的"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

有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特别需要关注。它们是：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以及后传统社会的出现。它们虽然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但是现在影响着整个世界。

吉登斯认为，如果像现在流行的那样把全球化仅仅看作一种经济现象，或者等同于资本主义和西方的持续扩张以及"世界体系"，都是不全面的。全球化实际上是时间和空间的转变，是"距离遥远的行动"。全球化的强化与全球通信和运输工具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不应该把全球化当作是一种倾向单一的统一过程，而是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变化倾向，其结果是混杂的，而且往往是相当矛盾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造成了统一，也带来了分裂；既产生了文化的扩散，也产生了多样化的要

求,要求恢复地方传统和文化认同;既加强了相互的影响,也激化了极端的封闭形式。

在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一方面个人对自我以及周围的环境的认识更深刻了,自我的选择性(包括肉体)增强了;另一方面,生活变得更具有"实验性",必须在各种问题上进行选择,没有根据可循。总的来说,个人的反思性提高了。

全球化的发展瓦解了行为的本土情景,后传统社会出现了。在吉登斯看来,后传统这个词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后现代"。后传统社会不是一个民族的社会,而是一种全球世界主义秩序;也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坚持和恢复传统的动力和压力。在后传统社会,包括传统和自然在内的所有东西都被"人化"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了。因此,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来维护传统,用自然的方式来保护自然。而且在后传统社会中,社会的反思性也提高了。

这三大变化集中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整体变化。实际上,吉登斯的分析中还提及了许多其他变化,例如阶级结构的变化。吉登斯认为三个变化影响了阶级结构。第一,传统社群模式的瓦解,新的地区化模式出现;第二,两性分工的变化,改变了男性

在劳动中的主导地位;第三,与阶级团结有关的文化符号的消失。这些发展的结果是:1)阶级变得更有个人特性,越来越少地体现为集体命运;2)生活方式和情趣,而不是劳动分工成为社会分化的标志;3)阶级失去了继承性;4)阶级不是个人的"终身经历",在一生中,个人有更多的职业经历;5)能否进入劳动市场变得更加重要。吉登斯对阶级的分析为他倡导打破阶级界限,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的选举战略提供了根据。

当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人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使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风险社会,不仅既有的制度蕴藏着、制造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制度建设的目的也要转向预防风险,尤其是人为风险的出现。吉登斯继续沿用自己的现代性四维结构提出了四种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是: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冲击;大规模贫困的发展;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存在;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这些风险的存在要求用更新的思维来加以解决。

(二)简单现代化与反思的现代化

吉登斯认为当代社会的变革反映了简单现代化向反思的现代化的转变,而转变本身蕴涵着乐观的可能性。他在这里使用的现代化概念既是现象学上

的，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简单现代化指的是现代化的初期，由工业化推动的社会发展带来了物质的繁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快速地进步，一切似乎都有明确而且光明的前途。而在认识领域中，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为这种明确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证明，而且给人们以充分的信心。当时开始兴起的社会科学在历史背景的制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也把追求惟一的目标、惟一的因素和动力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遮蔽了人们对现代性发展导致的不确定性的认识。反思的现代化是社会反思性增强的世界，是所有社会主体，从个人到团体、民族、种族、乃至各种组织的反思能力增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既有的所有认知标准都无法提供完满的而且惟一的答案，既有的制度不但不能防止并且保护我们避开人为的风险，而且还在制造着新的风险。因此，反思的现代化也是重新评价既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的过程，是重新认识我们生存的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的过程。

简单现代化/反思的现代化之分是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进一步延展，是他按照自己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勾画出来的。梳理一下吉登斯的略显繁琐的论述，我们可以大致把两种现代化作如下区分（见表

一）。

表一

简单现代化	反思的现代化
外部风险	人为风险（后果严重的风险）
福利国家	启发性政治
解放政治	生活政治
自由民主	对话民主、情感民主
生产主义	生产率
福利依赖	积极福利
预防性事后照顾	“二次机会”政治

吉登斯正是通过这些概念来建构自己所谓激进政治框架的。在以后各部分，我们将更详细地提到它们。

（三）走出左右的认识误区

吉登斯对于左右之争无法解决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在这里“主要（尽管不是全部地）关注的是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当然，他也承认，自己希望美国和欧洲大陆的

读者也能了解一下自己的看法，因为虽然各个工业化发达国家在历史、政治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面临的基本困境是一样的。

吉登斯认为，以伯克为代表的老保守主义主张等级制度、贵族政治、集体或国家优先于个人，并且过分强调宗教的重要性。他有些辩证地指出，如果换一个视角，可以发现保守主义也是激进主义，因为它反对资本主义。随着传统社会的结束，老保守主义与自己要恢复的社会形态一样也消解了，但是保守主义并没有消失，老保守主义的只言片语以及一些基本原则被后来的保守主义所继承和发挥。在二战后，主要出现了三种保守主义：哲学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右派。在英国哲学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迈克尔·奥克肖特。在西方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中，奥克肖特以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而著名。他认为理性主义由于对传统的抛弃，而拆掉了自己的基础。传统的存在为人们彼此的对话提供了基础。新保守主义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的。新保守主义者“承认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毁灭了有意义的社会存在赖以生存的传统符号和实践”。新保守主义并不讨厌

国家,认为政府应该适度干预经济。

新自由主义是过去十几年最有影响力的思潮,也是西方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理论。它有两个基本观点:市场至上,市场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是保证经济效益最大化、个人自由以及社会稳定的主要制度;个人至上,个人主义被视为小型国家民主制度成功的关键。哈耶克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吉登斯看来,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混乱。一方面主张国家的最小化,另一方面又要求有一个能够维持秩序,保证民族团结的"强"国家;一方面推崇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担心家庭的瓦解、道德的沦丧。"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存在着致命的矛盾。一方面,在鼓励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中,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把那种影响深远的解传统性力量释放出来。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帮助瓦解的那些传统符号被认为是社会团结必不可少的。"同时,新自由主义还否认社会公正的存在。

吉登斯对保守主义的梳理,主要目的是澄清关于传统的认识。他十分推崇奥克肖特对传统的看法,赞成保守主义对家庭、道德等的强调,但是不能用传统的形式来维护传统,那样只能导致原教旨主义。不能把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完全对立起来,也

许在简单现代化时期，二者的对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在当代二者之间的差别变得更加模糊。“如果采取批判的态度，新保守主义和哲学保守主义形式的保守主义在促进这样一个纲领(激进的)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我要告诉人们说，我们现在都该成为保守主义者——只是不以保守主义的方式”。

吉登斯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对于传统采取的是完全放弃的态度，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之中，认为只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参与到议会政治以及福利国家的建设中，但是在解决经济上依然没有摆脱控制模式，用国家的控制代替了市场调节。但是，“只有在人民相对固定地喜欢以及他们反思地参与大范围社会经济过程的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直接的经济控制才是可能的”。随着经济的复杂化，社会反思程度的提高，决策体制的变化，社会主义提倡的那种经济管理体制和官僚管理体制就无法维持下去。福利国家陷入困境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的困境。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寻求激进的改革，而

是集中精力来保护福利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或者说左翼变成了保守主义。

吉登斯认为，要解决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应该摆脱左右的对立，在保持激进主义的基本价值的同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营养，用后者对连续性的重视来缓解激进主义，使之成为温和的激进主义。同时，在后传统社会中，激进主义已经不是某一个集团的垄断物，正在被更多的社会团体所接受，其倡导的有些价值正在成为普遍价值，表达了全球的世界主义，因此再用左右的差别来看待当代问题变得毫无理由了。

（四）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

吉登斯提出的六点框架包括：

第一，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团结。

吉登斯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新自由主义改善了经济效率，但是用扭曲的“个人主义”破坏了社会团结的纽带，因此应该重新认识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在市场中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而是社会反思性的扩大。在一个高度反思的社会中，个人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作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但是自主不等于利己主义，此外还意味着互惠和相互依赖。重建社会团结不应该被看作在

一个利己主义的市场环境下保护社会和谐，而应被理解为在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中协调自主与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后传统社会中，增加团结依靠的是积极的信任。所谓积极的信任就是根据具体条件来确立不同的信任关系。积极的信任是双方的，不是单方；是透明的，不是隐含的；是全面的，不是有局限的。积极信任肯定了自主，保护了多样性的存在，既强调责任也强调权利。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

吉登斯认为，应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培养积极信任。在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之间明确权利义务，保持承诺的稳定，从而建立积极稳定的家庭关系并且保护儿童的权利；在政府机构内部以及机构之间创造建立和保持积极信任的环境；加大政府的透明度，增强那些受到政策影响的人的自主性；实现政治上的分权，提高中央地方的积极性；创造宽容的文化，使移民融入整个社会。等等。

第二，摆脱解放政治，建设生活政治。

吉登斯认为，左翼政治观点总是集中在解放上，目的是摆脱包括传统、专制、物质贫困、剥夺等各种不合理的东西。因此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是提供行为自主性的政治。在后传统社会，解放

政治的缺陷暴露出来，一方面它实际上是狭义的政治，只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没有把与生活有关的各种决策包括进去，因此失去了对选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只关注自主，忽视了相互依存和团结。现在已经建设生活政治。生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是认同的政治、选择的政治。它不仅包括个人生活，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要解决的是“集体人面临的挑战”。[①]

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概念的目的是力图把当代西方社会的各种问题都纳人政治议程之中，扩大政治关注对象的范围。尤其是对于激进主义来说，不仅要转变其主要关注的对象，而且要缓解其过于激进的观点。

第三，用启发性政治解决国家与社会、市场间的关系。

吉登斯认为，原来的左右争论始终把国家与社会、市场对立起来，只从一方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果常常是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反而带来新问题。随着社会反思性的普遍化和提高，可以在积极

---

① 关于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详细论述，请参见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七章《生活政治的兴起》。

信任的基础上确立启发性政治,把国家与社会、市场的积极方面都发挥出来,结合在一起。因此,"启发性政治是一种在存在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的环境下,寻求使个人和团体完成任务,而不是国家为他们完成任务的政治"。国家要为个人和团体所作的生活政治的决定提供物质条件和组织框架。

吉登斯最为得意的是,启发性政治是现在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的主要手段。例如,他认为以勃兰特委员会为代表的流行观点认为,要解决第三世界的贫困,就必须提高经济增长,并且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因此,一种可供替代的方案将是一个从许多地方性政策中汲取了营养的启发性政治方案。他认为这种方案包括以下优点:1)它考虑到当地人的"反思性参与";2)把破坏的限度放在基本的考虑范围内;3)把生活政治放在核心,重点考虑了"如何生活";4)推动作为发展的真正含义的"自立"和"诚实";5)把生态危机的两个根源区分开。富裕国家是环境危机的主犯,而贫困国家造成的损害是次级的,而且是保护性的,因为它们必须生存;6)提高妇女在劳动中的地位,这不仅改善男女平等,而且有助于降低人口增长;7)强调自主保健。鼓励基本保健由自己完成,平时注意健康,而且要及时解决

问题;8)在与家长制和剥削儿童作斗争的同时,要努力维护家庭纽带;9)不仅强调权利,还强调责任,防止依赖性的产生;10)要依靠国家、商业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在本质上必须是启发性的,要满足地方的要求,保护地方利益,否则只能恶化全球不平等。

第四,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

冷战结束之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似乎宣布了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吉登斯认为,虽然福山的有些观点——比如没有把经济个人主义归结为民主扩展的原因,强调民主化的独立性以及与自主和受人尊重的愿望有关——是合理的,但是他没有详细分析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没有充分考虑生态问题。而在现实中,西方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大规模异化,选民对政治冷漠,对政治领导人不满。而且民主制度依然局限在民族国家中。

有鉴于此,吉登斯提出要发展对话民主,对自由民主体制实行民主化。"对话民主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这可能对重建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甚至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贡献。"对话民

主得益于最近在西方颇为流行的“审议民主”。所谓的审议民主，就是通过广泛讨论，达成政策共识的民主，范围是正式领域。与它相比，对话民主的范围更广，而且更为重要的不是达成共识，而是自由表达和相互理解，要保持多样性。

吉登斯认为，除了正式的政治领域外，对话民主在下面四个领域中取得了进展：1)个人生活领域，包括婚姻、性关系、友谊、亲子关系、亲属关系等的民主化。在这些领域，很多问题是通过讨论、协商解决的。这是一种情感民主，对于促进正式的、公共的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那些能够在感情上采取积极的交流态度的人更有能力履行公民的身份。2)社会运动和自助团体的增加。虽然这些运动或团体也许在目的上不是民主的，但是它们为公众打开了更广的讨论和对话空间，尤其以前被掩盖的、视为禁区的。而且它们提高了个人的自主能力。3)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程度有所发展。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行政领域，都没有出现有些人担心的巨型公司或者高度的官僚化，相反它们比以前更灵活，更重视个人积极性的发挥了。无论是“后福特主义”还是政府内部的放权都代表了这个方向。4)在全球秩序中，不仅出现了民主机制，而且对话机制取得了重大的发

展。对话成了解决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这为各种文化、传统等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提供了基础，而且有助于削弱原教旨主义。

吉登斯承认，现在对话民主的可能性多于现实性，无法解决制度性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对话民主不取决于物质的平等，但是不平等确实会阻挡观点的表达或者扭曲对话交流的条件。因此还需要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关系的存在。

第五，改革福利国家，把福利依赖转变成积极福利。

福利国家也许是当代西方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吉登斯认为要解决福利国家问题，应该清楚地认识福利国家出现的根源和体现的思想。在他看来，福利国家的结构性根源有三个：1)工业化阶段，而且雇佣的有偿劳动具有核心而且决定性作用；2)福利国家总是民族国家。它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即实现内部稳定的组成部分；3)是为了应付风险而出现的。因此，福利国家体现的是生产主义、外部风险、传统的家庭分工等观念。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福利国家失去了原来的基础，而解决外部风险的手段无法解决风险。从这个角度出发，吉登斯特别强调“福利国家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应该被视为财政

危机，而是风险管理危机。”

有鉴于此，吉登斯提出要建立积极的福利，摆脱福利依赖。与本质上在事后解决问题，以分配为主要手段的福利国家相比，积极福利更重视使用生活政治措施，强调授权，发挥各种主体的自主性以及责任感。他的制度框架包括：必须摆脱把“预防性事后照顾”当作解决风险的主要手段，要从一开始就着手预防，并且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发展一种二次机会的政治，即，保持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使每一个人都有重新就业的机会，包括退休人员在内，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要比生产主义更关怀生命，强调工作的自主性，不能把经济增长当作惟一的目标，追求生产率，而不是速度；不仅在阶级之间，而且要在人口中的各种团体、阶层之间建立一系列的社会契约与协定，以此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

按照吉登斯的思路，传统的福利国家是阶级妥协的产物，而福利国家的改革也应该继续实现社会妥协，只不过妥协的双方不再局限在阶级之间，而是更多的社会团体之间、两性之间，防止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和恶化。个人都积极地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国家所做的只是提供更好的条件。因此，吉登斯

的积极福利实质上是建立在没有阶级矛盾，各方共担风险、共享权利的社会之上。

第六，在各个领域中消除暴力。

吉登斯一直认为暴力是现有政治理论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社会主义和自由都没有建立自己关于暴力的规范理论，而右派则一直倾向于把暴力看作人类生活的必要而且持久的特征。与理论解释乏力相对应的是现实中暴力充斥在许多方面，从家庭，到社会、种族间，再到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

在他看来，冷战结束后，"后军事社会"出现了，因为明确的外部敌人消失了，大规模战争功能过时了，古典民族主义的影响削弱了，次国家级民族主义崛起了。但是在全球体系中存在严重经济不平等的条件下，依然有爆发大规模军事暴力的可能，尤其是一些更小的军事力量拥有巨大的破坏力量。虽然如此，毕竟"后军事社会"带来了消除国家乃至家庭暴力的可能。因为大多数国家没有了发动战争的动力，众多的和平组织提高了人们避免战争的意识。而随着军事对社会文化影响的下降，妇女大规模加入到劳动队伍中并且法律地位提高，男性气概不再与战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军国主义相伴随的男子汉的价值正在被削弱，父权制以及男人对妇女的

暴力行为也相应被减弱。

针对现在存在的暴力问题,吉登斯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1)发挥对话民主的潜在力量。吉登斯认为: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地理分离、退出、对话和暴力来解决个人间、文化间的冲突。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前两种已经失去了作用,后两种成了首要的选择。而对话民主无论是否与更正统的民主体制结合在一起,都是"遏制或消除暴力的首要手段",因为它承认多样性,推动相互理解。2)反对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不仅是文化、宗教、种族意义上,还是性别意义上的,其本质就是反对对话,用传统的方式来维护传统,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以暴力对暴力,交往的退化。3)控制感情交流的退化。这尤其应用在家庭中。此外还要注意引起暴力的物质条件。

吉登斯认为,要实现这些任务,必须抛弃天命论和虚无主义。抛弃天命论意味着不把历史任务交付给某一个阶级,把人类未来寄托在某种体制上;抛弃虚无主义意味着在承认多种价值并存的同时,要追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这反映了他所谓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态度。因此,要发挥社会中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一种文化,以及每一个国家的积极作用。

六、警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以及随后一系列文章中充分显示出自己对各种理论的归纳包容能力，以及对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更合理解释，成为西方主流社会中颇有影响的理论家。1999 年他在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Reith Lecture”上就“全球化”作了演讲，用通俗的语言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对于苦苦寻求新的解释立足点的英国工党来说，这也正是选择吉登斯理论作为工党指导性理论的首要原因。

一种最全面的理论常常是最无法实现的理论。吉登斯所构建的理论似乎也陷入了这个悖论中。单纯从每一个观点来看，显得非常合理，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性、相互支持度如何，整个理论能否全面实施等都值得怀疑。而且，更令人感到不确定的是，吉登斯的思想现在与英国工党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工党下台之时也可能是他的理论破产之日。而工党能否在下一届大选中获胜还是一个

未知数。

虽然吉登斯用乐观的语调展望了一个更安全、更能动社会出现的可能，但是在现有的结构和秩序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海(Collin Hay)和华森(Matthew Watson)针对吉登斯讲座的观点，就指出：“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化话语已经被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它似乎‘无所不在’。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上因为它给一个上升的社会阶级的政治利益以特殊地位，排除了其他阶级的发言权，这样一种话语使某些世界观具有了‘正确性’，把它们简化为‘常识’。但是它显然是西方常识，只在这里被认为正常；只有有限的(主要)是西方个人拥有这种话语，它把一个‘萎缩世界’的经验提升为全球经验……虽然世界也许确实全球化了，但是某些人的经验显然比其他人的更加全球化。”[①]毫无疑问，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但是问题是究竟是一个参与的过程还是垄断的过程？是一个被动地接受过程，还是一个积极地应对的过程？是一个中心化下的多样化过程还是一个多样化

---

① Collin Hay, Matthew Watson, 1999 "*Globalization*: '*Sceptical*' *notes on the* 1999 *Reith Lecture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70, No.4, Oct - Dec.

共存的过程。这些矛盾才是全球变革的核心。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来说，这个过程肯定带有更多的风险。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由西方主导的全球体制中，吉登斯的理论似乎为霸权主义提供了行为合理性的证明。有人认为，“科索沃战争”是“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但是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这种理论在向意识形态转化过程中的胜利，因为它为某些国家的国际、乃至全球行为提供了表面上更合理的依据。战争是“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但是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这种理论在向意识形态转化过程中的胜利，因为它为某些国家的国际、乃至全球行为提供了表面上更合理的依据。

更可怕的是，在整个过程中，西方社会的左右两翼或者缄默，或者欢呼支持，难道左右的区别真的没有了吗？难道真的出现了一种能够超越左右的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现在似乎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是西方社会的许多方面毕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界限明确的领域现在被模糊化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霸权正在隐约显现。然而，任何霸权都有蜕化成

强权的可能，成为少数人维护自我利益的工具。[1]我以为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的人为风险。

（杨雪冬）

① 英国学者达伦道夫认为“第三条道路”带有威权主义色彩，从根本上忽视了自由，否定了选择的多样性。他认为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远不止两种或三种道路，有无数条道路，多种选择。Ralf Dahrendorf，“*The Third Way and Liberty: An authoritarian streak in Europe's new center*”，Foreign Affairs，Sep/Oct 1999，Vol.78，No.5.

推荐书目

全球化

Albrow, Martin. *The Global Age: 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作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全球化本身,我们更应该分析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会如何把我们带入到全新的相互依存的生存方式。

Bell, Danniel. "*The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3". Daedalus, Ⅱ6(3), 1987, Ⅰ-3Ⅰ.

这篇文章尝试着预测未来社会基本结构方面的变化,他得到的结论说,在全球化的推动力与现代的民族国家制度之

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vol. Ⅰ).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6.
一套三卷本的首次研究“网络社会”的著作,信息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体系。

Dicken, Peter. *Global Shift: Trans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3rd edn. London: Chapman, 1998.
最新修订的关于全球化经济活动的变化形式的报告。其中列举了来自不同产业的证据,并且指出了经济全球化会如何影响现在国家的主权形式。

Gray, John.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Books, 1998.
这本力著认为,全球化市场的不断延伸在全球造成了无数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能够适应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区域。

Held, David, Anthony Mc 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这本书非常全面地介绍了迄今为止的全球化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均衡的分析。书中介绍了“全球化怀疑

论"与其他理论的区别，我在本书的开始章节中引用了这些内容。

Hirst, Paul Q., and Grahame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Hirst 和 Thompson 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认为世界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往往被过分夸大了。

Korten, David C. *When Corporation Rule the World*. West Hartford, CN and San Francisco, CA: Kumarian Press and Berrett-Koehler, 1995.
对全球经济力量的发展进行了研究，着重研究了跨国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为了规范这种力量，人们应该做出充分的变革。

Mc Luhan, Marshall. *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为了表明新型通信技术的影响，本书介绍了人们经常说的"地球村"的概念。

Ohmae, Kenichi.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5.
Ohmae 的看法与 Hirst 和 Thompson 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反，他

认为全球化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以至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在处理它的内部事务时都不那么有力了。

Soros, George.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 New York: BBS/Public Affairs, 1998.
George Soros 是近年来最成功的金融家之一，他从金融市场获得了巨大财富，但他同时认为金融市场应该更加规范，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更多类似 1998 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与 Casino Capitalism 一书（Oxford: Blackwell, 1996）是同一作者，这本书认为跨国经济与政治一体化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已经形成非常重要的力量。

风险

Adams, John. *Risk*. London: UCL Press, 1994.
对风险本身和风险控制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讨论，Adams 认为分析风险必须要考虑人们在自身的行动中是如何进行有选择的反应的。

Beck, Ulrich.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一部认为我们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的经典著作。一个风险社会是指充满新的不确定因素、个人主义日趋明显、主要的社会形态发生本质变化的社会。

Beck, Ulrich. *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将生态政治学的兴起与由于现代技术而造成的自然界变化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了"自然"时才开始关心"自然界"。

Bernstein, Peter L. *Against the Gods: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Risk*. New York: John Woley & Sons, 1996.
本书对风险和概率论的历史之间以及与金融市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Bernstein 讲述了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精确的风险评估方式是如何发展的。

Douglas, Mary, and Aaron Wildavsky.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作者认为风险是不能客观定义的，什么是风险取决于特定人和特定组织的价值观。

Franklin, Jane (ed.). *The Politics of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从不同角度看待当前社会的危机的论文集。

Knighe, Frank Hyneman.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1921.
在这篇经典文献中,作者在经济活动中使用了风险的概念,并且描述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有许多人曾经受这种区别的影响,而实际上,风险是可以计算的,而不确定性是不可计算的。

Rephael, Adam. *Ultimate Risk*. London: Bantam Press, 1994.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地介绍了 Lloyd's 保险公司面临的各种问题。作者认为,Lloyd's 公司在伦敦遇到的麻烦根源还在于风险管理的严重不足。

Royal Society. *Risk: Aalysis, Perception, Management*. London: Royal Society, 1992.
一本关于英国大多数令人尊敬的科研队伍制造的风险的"官方"报告,起因在于令人注目的关于"客观风险"与"主管风险"的争论。

传统

Ahmed, Akbar S., and Hastings Donnan(eds). *Islam, Global-*

ization,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描述了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媒体迅速扩张之间的关系,原教旨主义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

Gellner, Ernest. *Postmodernism, Reason and Relig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对当时出现的宗教复苏进行了引起争议的讨论,宗教传统并不只是消亡,而是会不断地复苏。

Gross, David. *The Past in Ruins: Tradi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ity*.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2.
论述了在文化历史的背景下传统的特点发生的变化。

Heelas, Paul, Scott Lash and Paul Morris (eds). *Detraditionalization: Creitical Refletions on Authority and Identi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关于当今社会中传统消亡现象的论文集,其中包含了关于这种现象的严重性及其内涵的不同观点。

Hobsbawm, Eric J., and Terrence O. Ranger. *The Inver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这是一部经典著作,表述了很多我们认为流传已久的行为

习惯实际上是最近才形成的。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研究 1989 年以后的时期里世界社会出现的新分歧的一部著名文献。Huntiongton 认为世界上的新冲突主要是来源于不同宗教文化长期积累的矛盾。

Kepel, Gilles. *The Revenge of God: The Resurgence of Islam,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一部关于原教旨主义兴起的精彩著作。概述着重强调了将“原教旨主义”一词应用于伊斯兰国家的复杂性。

Kramnick, Isaac(ed).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1995.
18 世纪启蒙运动中著名思想家的著作集，其中包含 Barond Holbach 的作品。

Marty, Martin E., and R. Scott Appleby (eds). *Fundamentalism Observed* (*The Fundamentalism Project*,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研究在当前社会里原教旨主义的本质的多卷本著作的第一卷。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在这部有影响的著作中,作者批评了我们对于其他文化和传统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是不准确的,而且反映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过高的评价。

Shils, Edward A. *Tradi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81.
对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中的传统的本质进行了综合讨论。作者认为积极地看待传统是保持社会连续性和凝聚力的基本因素。

Vidal, Denis. "When the gods drink milk: empiricism and belief in contemporary Hinduiism". *South Asia Research*, 18, 1998.
本文研究了发生在印度1995年的一次意外的事情,印有大象之神Ganesh和其他神灵图案的"真正"的牛奶饮品被献给了这些神灵。

家庭

Burgess, Adrienne. *Fatherhood Reclaime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ther*. London: Vermilion, 1997.
讲述了当今社会里父亲角色的一些变化因素,作者认为应当给予父亲权力更多的关注。

Coontz, Stephanie. *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d the Nostalgia Trap*.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对过去家庭生活中的思乡情绪进行了粗暴的批评,Coontz 认为从来就没有家庭的“黄金时期”。

Duby, Georges. *Love and Marriage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一部关于中世纪的婚姻、爱情和性的经典著作,描述了很多基本的态度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1(first published in 1976).
对西方被性观念主导的现象进行讨论的著名作品。Foucault 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并不是简单地禁止人们的性观念,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反而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性观念。

Goode, William J.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 London: Free Press and Collier-Macmillan, 1963.
对全世界范围内家庭变迁的经典著作。作者认为,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共同的变化模式。

Jamieson, Lynn. Intimac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作者指出在现代社会里亲密关系已经有了变化，并且列举了来自西方很多国家的事例。

Laslett, Peter. *The World We Have Lost*. London: Methuen, 1965.
关于过去几代人家庭生活的经典著作，对有关家庭的一些神话提出了疑问。

Mclanhan, Sara S., and Gary D. Sandefur.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What Hurts, What Hel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研究美国单亲家庭对社会和教育冲击的优秀著作。

Philips, Roderick. *Untying the Knot: A Shot History of Divor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关于欧洲和美国离婚状况历史的一本书，值得一读。

Phoenix, Ann. *Young Mothers?* Oxford: Polity Press, 1990.
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十几岁的妈妈问题进行了讨论。

Weeks, Jeffrey. *Sexuality*. Chichester: Ellis Horwood, 1986.
生动而彻底地介绍了性研究的状况。作者对有关性本质的不同观点采取了均衡的态度。

民主

Barber, Benjamin R. *A Place for Us: How to Make Society Civil and Democracy Strong*.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8.
对民主、公民社会和法人团体力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除了稳定的公民秩序基础以外,有效的民主需要来自政府和商业双方面的规范。

Czempiel, Ernst O., and James N. Rosenau(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讨论了为适应全球化出现的新型全球性管理。

Dunn, John.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讨论社会上不同地区民主发展的论文集。就像标题表明的,本书认为要达到民主的统一化和令人满意政府管理形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Fukuyama, Fran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lton, 1992.
作者认为我们到了世界最终形式,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但作者也指出存在这种新型社会也

会最终引起新的不满的可能性。

Held, David. *Models of Democracy*,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对民主的不同概念进行了复杂的论述,但是值得一读。作者对未来的民主发展提出了一套设想。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对以前缺少民主的国家里民主制度的出现做了讨论,并对为何以及如何出现这种现象持吹毛求疵的态度。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y Press, 1990.
对超越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进行管理的适当方式进行了研究。

Paolini, Albert J., Anthony P. Jarvis and Christian Reus – Smit (eds).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Mamillan Press, 1998.
对出现影响国家主权的变化时进行全球性管理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一系列讨论。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0.
通过描述二战以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化,作者试图为世界政治的焦点问题找到答案。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交叉路口,旧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体制正在受到新的非政府组织和团体的多重核心体制的挑战。

译名对照表

A

acid rain　酸雨

actuarial prediction　保险精算预测

addiction　沉迷

Africa　非洲

Alcoholics nymous　酒鬼匿名会议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apartheid　种族隔离

arranged　包办(婚姻)

Argentina　阿根廷

Asia　亚洲

Asia-Pacific　亚太

aspects of　方面

Australia　澳大利亚

Austria　奥地利

childbirth 婴儿出生
children 儿童
children's right 儿童权利
China 中国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
Cold War 冷战
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通信革命
communist states 共产主义国家
concept of (风险)观念
constitutional reform 宪政改革
contraception 避孕
corruption 腐败
cosmopolitan 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世界主义
coupledom 同居
cultural expressions of 文化压抑
currency markets 外汇市场
custom 习惯
参见 tradition 传统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D

Darwinism 达尔文学说,进化论

electronic economy　电子经济
emotions　情感
end of　结束
end of nature　自然的终结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environmental issue　环境问题
equality of　平等
Europe　欧洲
European courts　欧洲法庭
European Union　欧盟
explorers, western　西方探险家
equallty　平等
external　外部(风险)

F

family　家庭
参见 sexual equality　男女平等
family policy　生育政策
family value　家庭价值
fate　命运
female virtue　女性贞节
financial system　经济体系
Finland　芬兰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

Great Britain　英国
见 Britain　英国
Greece　希腊
guardians of　辩护士

H

Held, David　戴维·赫尔德
Hemingway, Ernest　海明威
heritage industry　遗产业
Hindutwa　辛杜孔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传统的起源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Hong Kong　香港
hostility　敌视
House of Lords　上院
human　人(权)
human rights　人权

I

idea of　思想
India　印度
inequality　不平等
infant mortality　婴儿死亡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信息环境
information monopoly 信息垄断
information society 信息社会
insurance 保险
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
internal 内在(风险)
Internet 互联网
interventionalism 干涉主义
intimacy 亲密关系
invention of 起源
Iran 伊朗
Islam 伊斯兰
issues 论点
Italy 意大利

J

James Bond 詹姆斯·邦德
Japan 日本

K

Kenichi Ohmae 肯尼奇·奥玛
见 Ohmae, Kenichi 肯尼奈·奥玛
Kosovo 科索沃

L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laws 法律

Lloyds of London 劳埃德

Los Angeles 洛杉矶

M

Macedonia 马其顿

Malaysia 马来西亚

management of (风险)管理

Mandela, Nelson 纳尔逊·曼德拉

manufactured 制造(风险)

market-place 市场

marriage 婚姻

marriage laws 婚姻法

参见 family 家庭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media 媒体

见 television 电视

Mediterranean Europe 地中海欧洲 Middle Ages(European) (欧洲)中世纪

military dictatorships 军事独裁

Mill, John Stuart 约翰·密尔

N

O

P

paradox of　自相矛盾

parliamentary politics　议会政治

personal computer　个人电脑

Philippines　菲律宾

Poland　波兰

political　政治

politics　政治

poverty　贫穷

pollution　污染

Poor Laws, Elizabethan　伊丽莎白穷人法案

Portugese language　葡萄牙语

politics and　政治与(风险)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预防原则

pressure groups　压力集团

probability　可能性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Protestant sects　新教

Psychoanalysis　心理分析

'pure relationships' concepts　"纯粹关系"概念

Q

Quebec　魁北克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科学技术
Scots　苏格兰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selected reading　推荐书目
sense of self　自我感觉
sexual equality　性平等
sexual freedom　性自由
sexuality　性
'shell institutions'　制度外壳
Silicon Valley, California　加州硅谷
single-issue groups　单一目的团体
spread of　扩散
stations　言论
参见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单一利益团体
South Africa　南非
South America　南美
South Korea　韩国
Soviet Union　苏联
Spain　西班牙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单一利益团体
sub-saharan Africa　撒哈拉以南非洲
'super weeds'　超级杂草
Switzerland　瑞士

virtue of　女性贞节

W

warming　变暖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West Germany, former　(前)西德

Werstem Europe　西欧

women　女性

参见 sexual equality　男女平等

women, effects on　女性,影响

Wulfstan, Archbishop　沃尔夫斯坦大主教